

昆仑堂

二〇一四年
第三期
(总第四十期)
昆仑堂美术馆主办

封面题字: 朱福元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昇嘉 刘 墨

杨守松 杨 新

陆家衡 单国霖

夏天星 萧 平

鲁 力 薛永年

主 编: 俞建良

执行主编: 陆昱华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沈 江 陆昱华

俞亚琴 俞建良

顾 工 蒋志坚

地 址: 江苏省昆山市前进中路
109 号

电 话: 0512-57366892

传 真: 0512-57366893

网 址: www.kltartgallery.com

E-mail : ksklt@ksklt.com

邮 编: 215301

准印证号: JSE-005735

版面设计: 昆山亭林制版印务

本刊图文 未经同意 不得转载

目 录

馆藏精品赏析

张鹏翀的诗书画 陆昱华 2

书 画 研 究

忠义气 文人气

——倪元璐及其《淇园清趣图》考 俞建良 10

读吴山涛《赠孙韞生先生六章》札记 刘 鹏 14

人 物 研 究

文彭年表(三) 刘东芹 20

查士标与浙江书画关系考 任军伟 29

艺坛三绝谈月色 李海珉 36

易均室与成都: 楚云天隔锦里留

——民国金石学者潜江易均室先生寻踪 王可万 41

昆 山 片 玉

黄子澄墓碑发现记 郭志昌 46

艺 苑 零 拾

冯燎锦车出塞图 卜一克 28

张鹏翮的诗书画

□ 陆昱华

昆仑堂美术馆藏有清人张鹏翮的一字一画。张鹏翮(1688—1745),字天飞,又作天扉,号南华山人。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雍正五年(1727),张鹏翮40岁,举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十三年(1735),充云南乡试正考官。乾隆六年(1741),擢侍讲,充河南乡试正考官,迁詹事府右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七年,擢詹事府少詹事。九年,升詹事。仕途顺达,一路升迁,可以算是实现了旧时读书人的理想。乾隆十年(1745),张鹏翮以省墓乞假归,乾隆赠以五律一章,并赐白金百两,宠其行。行至临清,得病死,年仅58岁,“上眷之,久不忘,对群臣辄曰:‘张鹏翮可惜!’”^[1]亦可谓深得乾隆皇帝的眷遇。张鹏翮善诗文书画,《清史列传》称其“早擅诗名,才思敏赡……又工绘事,尤长山水,兴会所至,槃礴淋漓,书复苍润劲秀,时称三绝”,^[2]以此甚得乾隆赏识。笔者此文即略述其诗画。

一、张鹏翮的时代

《清史稿》卷五百四“艺术三·张鹏翮传”后有一段论赞:

自康熙至乾隆朝,当国家全盛,文学侍从诸臣,每以艺事上邀宸眷。大学士蒋廷锡及子溥,董邦达及子诰,尚书钱维城,

侍郎邹一桂,与鹏翮为尤著。

廷锡以逸笔写生,奇正、工率、浓淡,一幅间恒间出,无不超脱。源出于恽格,而不为所囿。邦达山水源于董源、巨然、黄公望,墨法得力于董其昌,自王原祁后推为大家。久直内廷,进御之作,大幅寻丈,小册寸许,不下数百。溥、诰各承其家法。维城山水苍秀,花卉傅色尤有神采。一桂以《百花卷》被宸赏,世谓恽格后罕匹者。诸人所绘并入《石渠宝笈》,御题褒美,传为盛事。”^[3]

这段文字虽然不长,但言简意赅,论述当时“文学侍从”多“以艺事上邀宸眷”,即“文学侍从”虽身居高位却多善绘事这一文化现象,并列举了其中几个最为重要的人物,如董邦达董诰父子、钱维城、邹一桂、张鹏翮等,一一稍加评述。这些人物今天早已成为美术史个案研究的对象,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但是为什么在康乾之际会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艺术盛况?

张鹏翮生活的时代,正是历史上所谓的“康乾盛世”,社会相对稳定。古代帝王,当天下初定,多喜欢养文学之士,借他们的笔来歌颂太平,同时也以此标举朝廷重视文治的政策。清朝的皇帝如康熙、乾隆亦然。如康熙二十一

年正月上元节,“赐廷臣宴,观灯,用柏梁体赋诗。上首唱云‘丽日和风被万方’,廷臣以次属赋。上为制《昇平嘉宴诗序》,刊石于翰林院。”^[4]以为故事。至乾隆九年,“幸翰林院……为柏梁体。御制首句曰‘重开甲子文治昌’,群臣赓续成之,张鹏翮亦与焉。^[5]并且他们都雅好艺文,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直接导致了当时“文学侍从”多善绘画的现象,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画状元”条记康熙时赐唐岱“画状元”故事:

圣祖天纵多能,艺事无一不学,亦无一不精。几暇作画赐廷臣,今海内旧家,尚有宝守者。时满洲参领唐岱,号静岩,工山水,尝召入内廷论画法,因御赐画状元,见胡学士敬《国朝画院录》。^[6]

这当然会对一班热衷仕进的士人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促成这一文化现象的真正原因或与清朝所实行的官制,即清朝的用人制度有关。文化往往是政治的产物,清朝的官制实际上为上述文化现象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清朝的官制,实行的是满汉“双轨制”,即各衙门往往兼设满汉官员,但汉人与满人的地位其实并不能相提并论。朱维铮先生形容清朝的这种“满汉双轨制”:

至迟在康熙到光绪两百年里,大清帝国的权力结构,在中央的阁部,必定双设首长。例如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侍郎、都察院左右都御史乃至下设汉臣的机构,无不双设首长并严分满汉。如六部均设满汉两尚书,满汉左右二侍郎。表面沿袭明制,实则以满足御汉。

况且满洲阁部大臣乃至卿寺官员,满人照例不问实事,却以监督汉人是否尽职为能,而且满洲大臣得以任职主要来自八旗子弟世袭的身份及特权,与汉大臣主要靠科举晋身的尺度,有很大区别。^[7]

满汉大臣在政府中实际地位和权力的不同,从

清朝入关起就已经彰显无遗,据《清史稿》“世宗本纪”记载:“十年春正月庚午,谕曰:‘朕自亲政以来,但见满臣奏事。大小臣工,皆朕腹心。嗣凡章疏,满、汉侍郎、卿以上会同奏进,各除推诿,以昭一德。’”^[8]汉臣不奏事,当然是因为他们没有实际的话语权,备位而已。而同年三月,顺治幸内院,少詹事李呈祥疏“部院衙门应裁满官,专任汉人”,顺治即驳斥道:“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委任,尔汉官奈何反生异意,若从实而言,首崇满洲,理所宜也。”^[9]李呈祥疏可以看作是当时汉臣争取话语权的要求,却被坚决驳回。“首崇满洲”,正是赤裸裸的尊满抑汉。因此,当时的汉人臣工,即便官至六部尚书或大学士,也往往只是装饰点缀,其实际无非文学侍从,诗文附和而已。如乾隆二年五月谕大学士张廷玉、徐本:“翰林乃文学侍从之臣,所以备制诰文章之选。”^[10]把一班翰林词臣的职责(实质)说的很明白。虽然翰詹官员也是“满汉双轨”,但由于各自出身不同,汉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因此首重文艺;而满人则以骑射为本事,如皇太极崇德六年谕王贝勒大臣:“尔等何不亲率人习射耶?子弟壮者当令以角弓羽箭,幼者以木弓柳箭。我国武功首重习射,……至于射艺,切不可荒废,嗣后严加督率是。”^[11]至顺治十年四月,“上幸南台,持弓顾谓诸臣曰:‘我朝定天下以此弓,朕于每年出猎二三次,练习骑射。今天下之大,机务繁冗,一应章奏,朕躬亲为批断,身虽不暇,心常念兹不忘。’”^[12]天下是马上得来的,也就想当然的马上治之。不论后来八旗子弟的骑射如何,但当时实际充当“文学侍从”的主要还是汉人。而他们也早已认清形势,安分守职,谨慎从事。即以董邦达、董诰父子为例,董邦达官至尚书,董诰仕至大学士,可谓位极人臣。二人都以善画得到乾隆帝的赏识,《清史稿》称“邦达善画,受高宗知”,而董诰则“承家学,继为侍从,书画亦被宸赏,尤以奉职恪勤为上所

眷注。”^[13]并且,他们在绘画上也都卓有成就,“邦达工山水,苍逸古厚。论者谓三董相承,为画家正轨,目源、其昌与邦达也。”^[14]即以为自董源、董其昌以至董邦达一脉相承,可谓南宗正脉,评价极高。然而除了绘事,他们在政事上却都没有特出的成绩和贡献,碌碌无为,徐珂《清稗类钞》正直类“洪亮吉斥董诰”条称:

富阳董蔗林相国诰,长子淇以荫官户部郎,中年夭折,相国悲咤。一日,偶谓门下士曰:“予自问生平无罪,西河之痛,天何罚之酷耶?”众或引孔子伯鱼、释迦摩侯罗为况者,相国愈不释。时洪稚存编修在座,最戆,率尔对曰:“师何无罪?师秉国钧,上之宜法皋、夔、伊、傅,次之亦当效房、杜、范、韩,乃庸庸祇祇,徒效孔光、石庆之所为,不能造福,即有馀殃,慎无以无罪自蒙也。”相国惘然久之。^[15]

洪亮吉指责董诰身为宰辅,秉国钧,而“庸庸祇祇,徒效孔光、石庆之所为”,石庆是汉武帝时丞相,小心谨慎,无大略。孔光是汉哀帝、王莽时的丞相、太师,居官惟恭谨承旨而已。洪亮吉以石庆、孔光比董诰,亦可见董诰的为官之道。

然而这正是当时所谓“文学侍从”的普遍表现,非独董邦达董诰父子如此。当时的“文学侍从”,往往只是挂一闲职而已,谓之宠遇优养亦可。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形容当时的翰林院和詹事府:

世称翰林院讲、读学士“无事日有事,有事日无事”。詹事府衙门“开印日封印,封印日开印”。盖每翰林院直日,讲、读学士递无事折。如有应奏事件,则由掌院具折,而学士弗与也。至于东宫官属,则政务清闲,用印日少,故有此对。^[16]

张鹏翮从雍正五年(丁未,1727)成进士,选入翰林,历官至詹事府詹事,都在清闲之地,遂得以寄情于诗文书画,又得以经常随侍帝王左右,以诗画娱乐至尊。陈康祺《郎潜纪闻三

笔》“张董世以绘画供奉内廷”,记文学侍从随侍情形:

乾隆丙寅,圣驾巡幸五台山,回銮至镇海寺,积雪在林,天然画意,因命侍臣张阁学若霭写之为图。及庚午岁,又命若霭兄阁学若澄图镇海寺雪景,御笔题诗其上,有“传语示其弟,坚瓠踪可师”之句。又辛巳西巡,尝命尚书董文恪公邦达即景图绘雪山。越十余年,文恪子文恭公诰随扈,复奉旨写雪山图进呈。上补题邦达画云:“辛巳西巡携侍臣,雪山即景写嶙峋。今来积玉仍千嶂,图上之人作古人。”又题诰恭进册云:“枚氏皋随蹕,雪山因命图。霁情宛可挹,家法未全殊。”桐城(张若霭)、富阳(董邦达),仍世清华,一家父子兄弟,以常杨供奉之班,擅荆关丹青之技,属车簪笔,荣荷天褒,此承平侍从之奇遭,非特艺林佳话也。^[17]

把承平时代,“文学侍从”以书画侍奉人主的“政治生活”形态描绘得栩栩如生。而正是因为他们这种特殊身份,实际促成了当时文学侍从雅善书画的现象。张鹏翮作为其中一员,当然也不免殷勤附和,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张鹏翮《松桂交柯图》,自题诗:“重岩紫翠接星台,桂子松花掩映开。万里明河临玉座,十分圆月湛金杯。云霞影拂衣香满,鸳鹭群联履舄陪。圣主万年臣赐帛,清秋楼阁胜蓬莱。”^[18]尽是歌颂赞美之声。

二、张鹏翮的诗

张鹏翮少有诗名,称捷才,《清史列传》称其:“幼多疾,资素钝。年十七,忽开悟,读经史如宿习,作文及诗,下笔数千言立就。”^[19]关于他的才思敏捷,故事很多,如他曾客居松江府署,刻蜡烛一寸为限,赋诗二十首。又他在京邸时,从早晨到中午,“作雁字落叶七律,上下平韵俱就”。古人常以“七步八叉”来形容诗思敏捷,史称张鹏翮“其为诗,叉手击钵,顷刻即成”^[20],即

许其为“七步八叉”之才。张鹏翮的捷才,在当时人的笔记中多有记载,是传为佳话的,阮葵生《茶余客话》“张鹏翮有谪仙才”所记最详:

张南华詹事,今之谪仙也,天才敏捷,于韵语具宿慧,兴到成篇,脱口而出,妥帖停当。尝试保和殿,未停(亭)午,众方舐笔着想,闻有投卷者,众曰:“必南华也。”与涇南司寇(张照)同奏事乾清宫门下,涇南携一汉制玉羊,南华曰:“咏此可乎?”即口吟四十字。语未毕,殿角淅然声震,众惊顾,乃四奄举一大冰,绳断,冰堕地碎且迸。南华曰:“咏此可乎?”即复吟四十字。众惊叹叫绝,涇南作诗序记其事。一日,午门送驾馆阁诸公各喝一韵,应声就,顷刻成数十首。喝韵诗古人所未有也。南郊视坛,家叔父董村先生同以讲官侍班,于斋宫铺棕处候驾,因指棕字为韵,南华冲口吟数十韵,至“凤邸凝云物,霓旌属宛虹。山河扶栋宇,日月倚帘栊。天阙常依北,招摇渐指东”,尤警绝,如河悬澜翻,不能自休,六曹九卿、羽林期门之士,环绕耸听,诧为异人。会驾将至,始悚惕辍吟。噫,伎至此乎!南华少时,作回文赋八首,自然清丽,亦前人所无也。^[21]

把张鹏翮诗情如涌而又爱诗成癖的性格刻画得形神毕肖。乾隆十一年,张鹏翮死后,乾隆曾与沈德潜论诗,还说“尔诗以风格胜,然不如张鹏翮敏捷”。我们知道乾隆也是特别喜欢写诗的,如他自己所说,“向曾留心诗赋,不过学问中之一事。时于几馀遣兴,偶命近臣属和,亦前代翰林典故中所有,并非夸耀己长,与文人角胜。”^[22]他的诗,就数量而言,大概是古今第一,罕有其匹。这或许也是他对张鹏翮特别眷顾的原因。

但清朝统治者对文学侍从们一直是并不放心的,常常以考试的方式,进一步钳制束缚他们。如顺治十年,即于太和门亲试,当时兼翰

林衔吏礼二部侍郎及内三院学士、编检以上官员共 62 人参加考试,“朕亲试词臣,量为分别”。^[23]至乾隆时,因有感于当时“翰詹等官,其中词采可观者,固不乏人,而浅陋荒疏者,恐亦不少”,于是亲自出题,于乾清宫对翰詹官员等进行考试。数年一考,优者擢升,劣者降黜,欲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张鹏翮曾参与了乾隆二年和乾隆八年两次考试。乾隆二年那次考试,参与者共 89 人。张鹏翮未及中午就已交卷,名列二等(其中一等 3 人,为陈大受、赵大鲸、张映辰。二等 10 人),^[24]“其受上特知始此。旋进《万寿圣德诗》百章,《经史法戒诗》五十章,又陈《十慎箴》,皆称旨。”^[25]乾隆因爱其才,遂不次拔擢,数年间即升为詹事,颇引起一些争竞之士的羡慕嫉妒恨。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十一年(此时张鹏翮去世已一年)谕:“词臣以文字为职业,自当雅贍优娴,方不愧清华之选。其中才学充裕,如张鹏翮、沈德潜等,间或一加超擢,而躁进之徒,竞思进献,若借此可以为梯荣之捷径。不知沈德潜优升阁学,朕原因其为人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张鹏翮则素知其敏捷,且资俸已深,历升詹事,初不因进诗优擢。若谓朕进用人才,沾沾于文艺之末,雕章琢句,专事浮华,此风一炽,必有藉手捉刀,希图侥幸者,岂不玷玉堂而貶羞文苑耶。”^[26]

张鹏翮对自己的诗才也是极为自负的。同为“文学侍从”,董邦达、董诰父子绝少在进呈御览的画上题诗,落款都是简之又简,往往只有“某某恭绘”数字。董邦达在乾隆八年的考试中名列三等,董诰是“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殿试进呈卷列第三,高宗因大臣子,改二甲第一”,当能诗,今天尚能看到他们遣兴所作的画上,也还是多有题诗的。因此,他们之所以绝少在进呈的画上题诗,可能是出于谨慎,藏拙自隐,“避席畏闻文字狱”。而张鹏翮于进呈的画上几乎每画必题诗,且“进奉诗文,多寓规于颂”,又



张鹏翮 翠巘高秋图 纸本设色
101×50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常常与乾隆相唱和,若非自恃其才,必不能如此。

张鹏翮为人潇洒,“修髯鹤立,人比之东方朔、苏轼”,而又“天才超迈,诗画皆援笔立就,潇洒自适,类其为人”。^[17]因此,他的诗多清新散淡。乾隆曾在题他的画中称“鹏翮汝诗脱筌蹄,欲侔元白志不低”,即称其诗志在与元稹、白居易比肩,也可见其志趣与格调。而沈德潜序张鹏翮诗曰:“读南华诗者,遇之人间烟火外

可也。”^[28]自是一种超迈气象。

张鹏翮著述甚丰,有《进呈集》、《赓韵集》、《传宣集》、《双清阁集》、《南华诗钞》、《南华文钞》等。

三、张鹏翮的画

张鹏翮诗书画称“三绝”,《清史稿》本传称其:“画无师承,自然入古。虽应制之作,萧散若不经意,愈见神韵。”^[29]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张鹏翮《翠巘高秋图》,自题:“臣学画以来,将及三纪。通籍后,所遇山水古迹,触发殊少,倘蒙睿鉴,指示秘要,得所师承,庶稍脱凡近也。乾隆九年甲子重阳日,詹士臣张鹏翮恭进。”^[30]按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张鹏翮说自己学画“将及三纪”,即三十五六年,乾隆九年(1744)张鹏翮57岁,前推三十五六年,则张鹏翮学画约在二十一二岁。又金瑗《十百斋书画录》著录张鹏翮所画《枯木竹石》,自题“余少学枯木竹石,颇得其趣。醉后云烟入笔,乃不知兴之所至而成”,^[31]则其学画当较早。

张鹏翮善画山水,师法自然,“爱佳山水,裹粮往游,粮尽而返,无系恋”。又于元四家情有独钟,爱其高致远韵。这都是和他潇洒自适的性格相一致的。沈德潜记其“为人作画,十数纸顷刻尽,或终岁不可得。综其生平,取适而已”,^[32]可见其率性。

张鹏翮诗画同参,于绘画特别讲求气韵,这本是文人画传统,谢赫“六法论”即以“气韵生动”居于首位。张鹏翮与人论画,“谓右丞、董、巨,萧散闲逸,全以韵胜。后代精工严整,无一笔无成出,然弥近弥远。指点画理,无非诗趣。自道所得,评者不能异辞。”^[33]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谓“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34]即以王维、董源、巨然为南宗画的正宗,而南宗画即以气韵胜。张鹏翮说王维、董源、巨然都是以韵胜,并批评后人一味追求精工严整,反而失去了气韵,从中亦可见他的趣尚。张庚《国朝画徵录》

亦记其：“尝曰：‘近来画道非庸即俗，日就凌渐矣。不极力振刷，安继前徽？’观其笔力，足副其言，洵画苑之后劲也。”^[35]可见他对当时画坛规规于形似而全无韵致的现象很不满，并有志提撕振刷。

张鹏翮的画也得到乾隆的赏识。他曾画《日长山静》便面进呈，乾隆即于画上题诗：“仿佛前生是葛三，画禅潇洒擅江南。大痴更拟坡仙笔，劲敌江山两不惭。”^[36]谓其兼得黄公望、苏东坡笔法，评价极高，虽不无过誉之嫌，但张鹏翮的画当亦不俗。张鹏翮山水“师元四家，尤长倪（云林）、黄（公望）法”^[37]。上海文物商店藏张鹏翮《仿倪瓚山水》，自题：“用笔平淡之中，取意酸盐之外，此云林妙境也。学者会心及兹，是有逢源之乐矣。拙作雅未能仿佛其万一，然喜无尘俗气味，使云林而在，亦庶几或以为可。”又竹痴道人题：“董文敏评云林画如天骏腾空、白云出岫，无半点尘俗气，斯言洵不诬也。南华山人师之，能得其神髓，用笔简远，从胸中百卷书流出，此等画，非俗眼所知。”^[38]张鹏翮于画力矫时弊，参透云林之高韵，格调绝俗。

张鹏翮画多“入《石渠宝笈》，御题褒美”，计《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编》收画五幅：《桃花寺八景》、《春山出云图》、《秋林读书图》、《翠巘高秋图并题》、《松梅清韵图并题》；《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收画八幅：《春林烟岫》、《花卉山水并题诗》、《西山秋眺并恭和御制诗》、《淡设色山水并题》（张鹏翮、励宗万书画合璧）、《春林澹霭图并书纪恩诗》、《翠巘高秋图》、《松桂交柯图》、《秋湖夜泛图》；《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收画四幅：《山水》、《万壑松涛》、《盘山图》、《孙康映雪》。这个数字与董邦达、蒋廷锡等人比较，实相去甚远，这或许正是他“或终岁不可得”“取适而已”的性格所致。

四、张鹏翮书画赏析

昆仑堂美术馆藏张鹏翮行书诗轴（见封

二），纸本，98×37.5cm，录诗一首：“小园数树娑娑影，残岁萧闲坐半龛。一饷松风吹断梦，宛随驿使度江南。张鹏翮”，钐“张鹏翮印”（白文）、“南华”（朱文）、“天游子”（朱文），而未署书写时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张鹏翮《松梅清韵图》，题诗四首，其三：“小园数树娑娑影，岁宴萧闲坐半龛。一饷松风吹梦醒，宛随驿使度江南。”与昆仑堂美术馆所藏诗轴内容大同小异。又其第四首：“万事无营任自然，纸窗灯火钱华年。呵寒写出双清影，拟荐新诗玉殿前。乾隆七年壬戌嘉平，日讲官少詹事臣张鹏翮恭进。”^[39]



张鹏翮 松梅清韵图 绢本
107×50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张鹏翮 山水局部

张鹏翮自题“拟荐新诗玉殿前”，可知此诗为其所作，又是新诗。又署“乾隆七年壬戌嘉平”，嘉平即腊月，也就是夏历十二月。乾隆七年嘉平约为1743年1月。则昆仑堂美术馆所藏张鹏翮自书诗轴的书写时间当亦在此前后。

这两首诗的文字稍有不同，即自书诗轴中的“残岁”、“吹断梦”，在《松梅清韵图》中作“岁宴”、“吹梦醒”，其中用意，很是微妙。后者自题作于嘉平月，正是岁末残年，但因为是进呈乾隆御览的作品，因此题诗只能颂太平，而不能出现“残年”这样不吉利的字样。张鹏翮是江南（嘉定）人，岁末临近，思乡之情尤为深重，“一饷松风吹断梦，宛随驿使度江南”。正是他此时心情的真实写照，但“吹断梦”似乎有太多消沉悲观的情绪，自然也不宜出现在恭进之作上，可见当时作为文学侍从的张鹏翮，遣词造句，是如何的谨慎。^[40]

通过对这两首诗的比较，自书诗轴当作于前，而《松梅清韵图》作于后。大约这本是张鹏翮在岁末的遣怀之作，略改两字后题于画上，

进呈御览。或许也借此隐约表达了他致仕归乡的意愿。史书虽说张鹏翮甚得乾隆眷遇，但以张鹏翮的性格，必不能适应这种谨慎奉承的生活，大不自在。如乾隆九年八月，乾隆亲祭社稷坛，张鹏翮因为连声咳嗽，而“著交部察议”。^[41]到了乾隆十年，张鹏翮以省墓为由，乞假归。也许他一直有归隐之志，但不幸病死于途中。

张鹏翮善书法，其书“苍润劲秀”。清初书法，由于康熙、乾隆二人对赵孟頫、董其昌的偏爱，一班士人往往也受赵董的影响，成一时风尚。我们在张鹏翮的书法中也能隐

约见其痕迹。其书用笔简净，似赵孟頫；而气韵萧闲，则似董其昌。率意挥毫，全无半点尘俗气，都“从胸中百卷书流出”。

昆仑堂美术馆藏张鹏翮山水（见封三），纸本设色，89×40cm，画群山耸翠，飞流喧豗。其下水面开阔，一平如镜，一舟子闲坐船头，悠闲自在。自题：“钱叔宝画自文待诏入手，晚乃出入叔明、子久。其笔古质，颇类五代以前人。甲辰秋月，南华张鹏翮。”钤“南华”（白文）。甲辰为1724年，张鹏翮37岁，是其早年所画。题语述钱叔宝（穀）画的师承风格，可知此图为其拟钱穀画法，而又略参叔明（王蒙）、子久（黄公望）笔意。皴染细密，用笔精谨，格调清新，与其晚年用笔粗率、热情奔放的画法大不同。

张鹏翮书法作品传世甚少，而其画又多为中年后为文学侍从时所作，早年作品亦极为罕觐。因此，昆仑堂美术馆所藏这两件张鹏翮书画作品弥足珍贵，是研究张鹏翮书画艺术的重要文献。

（作者单位：昆仑堂美术馆）

注释:

[1]《清史稿》卷五百四“艺术三”，中华书局，1998年，第13910-13911页。

[2]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七十一“张鹏翮”，中华书局，1987年，第5842页。

[3]《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第13910页。

[4]《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第209页。

[5]《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932页。

[6]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中华书局，1984年，第142页。

[7]朱维铮《满汉双轨制》，《重读近代史》，中西书局，2010年，第50-51页。

[8]《清史稿》卷五，中华书局，1998年，第131页。又蒋良骥《东华录》顺治十年正月谕内三院：“朕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齐鲁书社，2005年，第100页。）

[9]蒋良骥《东华录》，齐鲁书社，2005年，第102页。

[10]《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749页。

[11]蒋良骥《东华录》，齐鲁书社，2005年，第41页。

[12]蒋良骥《东华录》，齐鲁书社，2005年，第100页。

[13]《清史稿》卷三百四十《董诰传》，中华书局，1998年，第11089页。

[14]《清史稿》卷三百五《董邦达传》，中华书局，1998年，第10518页。

[15]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第3039页。

[16]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中华书局，1984年，第136-137页。

[17]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中华书局，1984年，第814-815页。

[18]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故宫书画图录》，第十一册，1993年，第347页。

[19]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5842页。

[20]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5843页。

[21]阮葵生《茶余客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8页。

[22]《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622页。

[23]蒋良骥《东华录》，齐鲁书社，2005年，第102页。

[24]《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754页。

[25]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七十一“张鹏翮”，中华书局，1987年，第5842页。

[26]《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749页。

[27]《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第13910页。

[28]沈德潜《张南华太史诗序》，《沈德潜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325页。

[29]《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第13910页。

[30]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故宫书画图录》，第十一册，1993年，第343页。

[31]金瑗《十百斋书画录》，《中国书画全书》第七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第636页。

[32]沈德潜《张南华太史诗序》，《沈德潜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325-1326页。

[33]沈德潜《张南华太史诗序》，《沈德潜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325-1326页。

[34]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画源》，《董其昌全集》叁，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121页。

[35]张庚《国朝画微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102页。

[36]宴棣《国朝书画名家考略》卷七记张鹏翮：“尝以所绘《日长山静》便面进呈，上题云：‘仿佛前生是葛三，画禅潇洒擅江南。大痴更拟坡仙笔，劲敌江山两不惭。’”（《中国书画全书》第十一册，第674页。）又杨鍾羲《雪桥诗话续集》卷四：“所进《春林澹霭图》及《日长山静》画扇，皆称旨。高宗依韵赐和，并制诗褒美，有‘螭头奏对春风霭，写出春林六绝胜’及‘大痴兼擅东坡笔，劲敌江山两不惭’之句。”（《雪桥诗话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046页。）

[37]张庚《国朝画微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102页。

[38]《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十二，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59页。

[39]图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故宫书画图录》第十一册，1993年，第339页。

[40]徐珂《清稗类钞》记“钱维城以绘事受知高宗”条，亦可见当时文学侍从之谨慎：“武进钱司寇维城画，与富阳董宗伯邦达齐名，……尝扈游中盘，上顾司寇，使画盘山图。阅日进览，御制三十韵题图首，司寇作恭和诗，有句云‘绘图奉宸命，怵惕久未报’。”（中华书局，1984年，第310页。）

[41]《清实录》乾隆九年八月，谕：“今日朕亲祭社稷坛，张鹏翮于站班之地连声咳嗽，甚属不合，著交部察议。”（中华书局，1985年，第863页。）

忠义气 文人气

——倪元璐及其《淇园清趣图》考

□ 俞建良

晚明时代的书画名家,除王铎外大多数传世作品较少。特别是有气节者则更少,如黄道周、倪元璐、史可法、杨文骢等,值得研究。这里就倪元璐及其《淇园清趣图》,作一小考。

倪元璐(1593-1644),明万历二十年生,崇祯十七年卒。字汝玉,号鸿宝,别署园客。浙江上虞人,明代著名书画家。自幼颖悟,17岁时,郡、县、监司三试皆第一。19岁那年,华亭陈继儒见其书法扇面大为惊叹,诧为仙才,日后便名传江、浙名城。29岁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官至户、礼部尚书。倪元璐为人清正,有忠义之气。天启七年(1627)出任江西乡试之主考官,时宦官魏忠贤垄断朝政,败坏纲纪,倪元璐出考题讥讽之。崇祯帝即位,诛魏忠贤,元璐才幸免于祸。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占居庸、围京师并破内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亡。倪元璐闻讯后以帛自缢于家中。至福王时谥文正,清改谥文贞。

倪元璐诗文、书画俱工,以气节、书画名世。其书法深得颜鲁公厚实劲健之笔意,而更为劲峭,结体趋于扁方,呈欹侧之势,以险寓正,风格奇倔刚毅,于明末自成一格。清人吴德璇《初月楼论书随笔》评曰:“明人中学鲁公者,无过倪文公”。倪元璐与黄道周、王铎为同年进

士,与黄道周性格相近,二人情意甚深,在翰林院时,曾与黄、王砥砺学行,相约学书。倪元璐学书一度主攻苏东坡,兼学王羲之。行草书用笔苍古劲爽,结字跌宕奇逸,章法字距茂密,行距宽疏,注重节奏变化,书法以气骨见长。秦祖永《桐阴论画》中说:“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康有为曾评:“明人无不能行书,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

倪元璐绘画,以山水见长,皴法渗涌书法之用笔,苍润古雅;其构图师法宋元,有李成、倪瓒遗意。清人陶元藻在《越画见闻》评云:“倪以雄深高浑见魄力,徐渭以萧疏古淡见风神,廊庙山林,原不容并列,况倪有忠义之气,流露毫端,去人自远。”关于倪元璐画风,清陶元藻《越画见闻》云:“余旧有山水一幅,仅一角完好,余绢尽碎裂,不能装潢,藏于篋中,为人索去。又于友人处见其数幅,山皆峻嶒兀聳,林木则苍莽忽郁。皴法喜用大小劈斧,总不屑描头画角,以取媚于人。”清代山水画家戴熙《习苦斋画絮》录清人恽光宸评倪元璐画云:“余所见鸿宝画,大抵仿倪为多。师云林当从鸿宝入。”

近读倪元璐《淇园清趣图》,绢本,纵204厘米、横52厘米。是图左上角倪氏题“淇园清趣”四字,款落:“鸿宝”。钤白文“倪元璐印”、

“玉汝”二印。故宫博物院杨新先生观后笑曰：“信手急就成，文人气，传世佳作也”；便欣然题“倪元璐淇园清趣图”。款落：“癸巳春暮，杨新题签”。盖白文印“杨新”。在倪氏作品下角，杨新先生还盖上“湘阴杨新审定”朱文一印。是图原有鉴赏收藏印均为朱文，分别是：“钱塘戴氏家藏”、“醇士”、“柳外静所藏”、“梅堂吕神审定秘玩”、“晴岳”等。其收藏印中“钱塘戴氏家藏”、“醇士”即戴熙。戴熙（1801-1860）清代官员。工诗文，善书画，喜收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道光十一年（1831）进士，十二年（1832）翰林，官至兵部侍郎，后引疾归，曾在崇文书院任主讲。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克杭州时死于兵乱，谥号文节。其他收藏鉴印，待考。

观《淇园清趣图》，其山、树，各占画面一半，极为新奇。上部高岭竞立，丘壑峣峣。中部云雾缭绕，松在云前，部分松针在云中，树下曲栏紧靠房屋，竹林紧围，富有生机。犹如春山含笑，给人以阳和日丽之感。远处浅绛山峰为没骨法，与松竹花青浅着色呼应，具天真幽淡意趣。其山势为宋人笔墨，而树法具元人风韵，位置经营可谓别具匠心。而其高处飞瀑，奔流而下，直冲云间，使之打破云雾之宁静。此外，《淇园清趣图》画面之下部，山石、溪流，画法受同时期明末画家董其昌影响。

再考《淇园清趣图》之款识，因其落款文字太少，很难一眼判断。但观画笔之势，与落款极为一致。考其画风与上海博物馆藏倪元璐《山水图轴》一致。再考其“淇园清趣”四字，书风与故宫博物院藏倪元璐书《杜牧诗轴》相接近，书法用笔娴熟，点画劲爽。特别是转折处浑圆之意较浓，结字疏密相间，开合有度。这与人们常见倪元璐的书法风格左低右高之欹势有异。再如倪氏转折期书《世说新语》草书轴，其书法笔致流畅凝炼，字形端整匀称。其中“是”字与《中国书法全集》倪元璐卷之自作诗“一城春雨万家烟”草书轴之“是”字同，而此二“是”字其尾笔与《淇园清趣》之“走”字运笔同。其实倪元璐书法也有探索的过程，曾得颜鲁公笔意，又因与黄道周情深，相约学书，一度主攻苏东坡，兼学王羲之。故在“淇园清趣”四字中，不难找到其蛛丝马迹。四字属王字中来，因写在绢上，行笔流畅，而转折多呈圆势。且“清”字写法，与颜鲁公《祭姪稿》中“清”字同。又与苏东坡《醉翁亭记》之“清”字近；而“园”



倪元璐 淇园清趣图



倪元璐 书杜牧诗

之外围,与颜鲁公《争座位稿》近;“淇”字各家没有此写法,但此字既有《祭姪稿》风格,又有《醉翁亭记》之意趣。又:黄惇先生在《中国书法史》元明卷中指出:倪元璐“书法的丰富变化中,可窥不仅得力于晋人及颜鲁公的用笔,结体上也显然受到宋人苏东坡、米芾的影响……”。由此判断,此款识当是倪氏研探颜、苏时期的作品。按此推理,此图亦然。图上落款



倪元璐 山水图轴

“鸿宝”,仅见《中国书法全集·倪元璐卷》信札两通,故宫博物院藏,其余均为“元璐”或“倪元璐”。再说落款“鸿宝”,这不是个例,明末董其昌的书画作品,如其书法作品,款落往往为“其昌”或“董其昌”;如是绘画作品,款落“玄宰”或“董玄宰”。故时人有“书非其昌不买,画非玄宰不收”之说。其实也有例外,这倒给书画鉴定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淇园清

趣图》与上海博物馆藏倪元璐《山水图轴》相类。此图左上方有高凤翰跋“先生文章节义不当作书画求者,此画重品,未可以常格评也。”此语反映出高凤翰对节终明朝的倪元璐敬仰,不能用专业画家的艺术标准去品评。故在作品诗堂部分又题“节概人笔墨,对之能增长气魄,固当于患难艰陋中供之”,按左思《吴都赋》称“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概之风”,李周翰注:“俗有志节



倪瓒 《幽涧寒松图》局部

梗概之人。”高凤翰称倪元璐为节概人，足见其对倪元璐的德行极为钦佩，对其作品亦倍加推崇。倪元璐的《淇园清趣图》和《山水图轴》，其山势均出自宋代名画家李成的《群峰霁雪图》；而松树的简约、两笔平行而成，如元四家之一倪瓒的《幽涧寒松图》，笔墨淡雅，松树两株相依，意境萧疏荒寒。纵观《淇园清趣图》和《山水图轴》，山石、树木，全用长线条作皴，且笔笔中锋。再读《淇园清趣图》所绘竹林，包括其围栏、房舍特征，均深受明代沈周、文徵明、陆治的影响。其青竹虽逸笔草草，而仍居于画面之中，实是点景之处，这就是华夏第一园的淇园。

淇园被誉为我国第一座王家园林，位于河南省淇县境内，为卫武公（公元前853年—公元前758年）所建。卫人歌颂卫武公的《诗经·卫风·淇奥》以淇园竹比兴：“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故淇园曾是我国古代最有名的竹子繁育基地。到了东汉章帝时，淇园仍是那么美丽诱

人，汉章帝率朝中文武大员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多姿多彩的淇园。后人又在淇园内建武公祠，每年春秋祭祀则更多。明朝诗人刘璟作《淇园春霁》诗云：“驻马淇园春正浓，三山云外耸芙蓉。武公去后琅玕少，霁色漪漪入画中。”作者刘璟是明朝开国元勋刘基刘伯温仲子，戎马倥偬中驻马淇园，欣赏淇园景

色后，若有所思，敬仰古君子卫武公。诗中“武公去后琅玕少”，就是惋惜淇园的竹子在减少。或许是卫武公政通人和，深得周、卫百姓爱戴；或许因刘璟作《淇园春霁诗》，对倪元璐的影响，才有了《淇园清趣图》作品的传世。

另据梁章钜《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尾》录许友跋《倪文贞芦鸭轴》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余“少年师事倪鸿宝先生，诗字画皆得其指授”。考许友，约1620年—1674年前后。原名采，曾名宰；又名友，字有介，又更名为眉，字介寿、介眉，又名友眉，号瓯香居士，福建福州人。明崇祯间举孝廉，以诸生终，入清不仕。许友工书善画，诗尤孤旷。时称“三绝”的草书、山水和诗文，师倪元璐。山水、松竹挺拔不群，诗文、词赋清旷脱俗。可谓是倪元璐的继承者，惜其作品传世不多。

倪元璐著有《倪文贞集》。并有《倪鸿宝山水画石册》民国7年（1918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印。

（作者为昆仑堂美术馆馆长）

读吴山涛《赠孙韞生先生六章》札记

□ 刘 鹏

2001年,汪世清先生发表了《吴山涛〈西塞诸诗〉册》^[1]一文,对《西塞诸诗》进行考证,并整理出吴山涛入清可确知的行踪,有北京、德清、苏州、扬州、成县、杭州等。但汪先生未见吴山涛《赠孙韞生先生六章》手卷。手卷里提到的吴山涛在南京的行踪,更是为“系年简述”所阙。这卷手卷既是吴山涛生平研究的重要发现,更是记载休宁孙丕璫家世、事迹及交游的翔实资料。

《赠孙韞生先生六章》为纸本,高27厘米,宽229.5厘米。共六首五律,每首诗后都有吴山涛自注。吴山涛(1609—1690),字岱观,晚号塞翁,徽州歙县人。晚年隐于西湖,以书画自娱。善山水,为“天都十子”之一。孙韞生即孙丕璫,字韞生^[2],安徽休宁草市人。孙丕璫与髡残、程正揆交善。康熙七年(1668),程正揆为其作《山水册》(广州美术馆藏),册后有髡残、张恂跋,程正揆题“孙韞生不自居鉴赏家,每阅古迹辄具眼,盖深于古而不泥于古”^[3];康熙九年(1670)髡残为其作《绿树听鹈图》(上海博物馆藏),称“韞居士不但鉴赏具眼”^[4];知孙丕璫亦精于书画鉴赏。

诗卷有五律六首,分别讲述了两人的定交、来往与孙家事。第一处自注,吴山涛自述“君为予家世戚”,但“乙卯始得定交白门”。两家世

好,两人的定交却是在康熙十四年(1675)的南京,吴山涛时年67岁。注中还提到孙丕璫富收藏,所交多方外隐君子。

第二处自注中提到“元虞文靖公颜其始祖之堂曰‘孝友’”,元代虞集曾为孙家始祖之堂题写“孝友”二字,入明之后,题咏者不断,孙丕璫俱勒之于石。自注对于孙丕璫在南京的住宅位置所述甚详,“金陵聚宝门内镇淮桥,古名朱雀航,君买宅其上”,孙家就在南京聚宝门(今中华门)内镇淮桥一带。镇淮桥古名朱雀航,即著名的“朱雀桥”。

第三处自注讲到孙家荆园在当地的名望,“草市荆园,名重东南”;当时的荆园,极为知名,汪道昆曾撰有《荆园记》^[5]。继而又谈到了孙丕璫的父亲孙光宗:“君考又构奕园,名公巨卿题咏之多,已刊成史”。这里说的“已刊成史”,即指孙光宗所辑《奕园杂咏·奕园史》^[6]一书。关于孙光宗另构奕园,钱谦益在《海阳孙徵士照邻墓表》中也有提及:“先世荆园归世父,而自辟地为奕园”^[7]。吴山涛还提到:“荆为友子卖去,君独赎还,里党传为克复美谈”,可见之后荆园被转卖,赖有孙丕璫重新购回,在当地传为美谈。

第四处自注谈到了孙家隐德及孙丕璫的师承。孙家历有贞女,竟成《列女传》。孙丕璫的祖

父孙承训卒后被“里人私谥贞惠先生”，由董其昌书《谥议》。然后又由孙光宗的不仕讲到了孙丕璫的求学：“山左学宪项公屡书招之，不赴。君少负笈从师绣水项仲展公”。山左学宪项公即项梦原（1570—1630），原名项德棻，字希宪，浙江樵李人，项笃寿次子。万历己未（1619）会试第二、廷试二甲五名，授刑部山西司主事。富藏书，著《读宋史偶识》，并校正《古今印则》。崇祯刻本《嘉兴县志》有《项宪副公行略》。项梦原家多蓄宋元名迹，李日华为其撰《项宪副希宪六十寿序》^[9]。

关于孙丕璫负笈从师项仲展，其中的缘由，据《海阳孙徵士照邻墓表》载：“（光宗）少师事嘉兴项希宪，希宪视学山东，念其食贫，屡招之不往。且死，以长笈属其子希宪。希宪命从子仲展为之师”。因孙家与项家有深交，孙光宗在临死前，将孙丕璫托付给项梦原。项梦原命从子仲展为其师，仲展“教之甚勤，左提右挈，不遗余力”。仲展即项鼎爰，后改名项声国，字仲展，为项梦原从子、尚书朱国祚之婿。项声国之父项德桢曾将其过继给项梦原，但因项德桢长子项鼎铉早卒无后，项梦原又将项声国归于项德桢。崇祯甲戌（1634）廷试，项声国中二甲三十九名^[10]，例授雅州知州。后补太平府推官、监军，未任歿于京师。孙丕璫曾请南昌黎元宽（字左严）为项声国作传，黎元宽在传中称赞项声国在文章中衰时能“大为振起，海内所目名家。即非一辈，必上首归之。”^[11]

第五处自注提到了孙丕璫助友刊刻的一部佛典及为人处世的两件事。少府唐时（字宜之）撰有《如来香》，但一直未付梓。唐时“易箴时授君任之”，孙丕璫受其所托“二十年间募刻资于同人，得二百一十两”，仍不足，乃“捐五百缗”，终于在康熙十五年（1676）刻成《如来香》十四卷^[12]。卷前唐时二序，由查士标手书，卷后由孙丕璫作跋。据孙丕璫跋，知唐时墓在南京祖堂山下，因唐时无子侄为嗣，孙丕璫为其“稍稍修葺”，并托好友钱陆灿铭刻之。

甲申年（1644）冬，有人想弹劾黄正宾献媚于宰执，孙丕璫说到：“此吾乡争国本廷杖者，忍害之乎”，故从中周旋。黄正宾知道后，乃“泣下沾襟”。其实，黄正宾在这之前去过孙家奕园，并作有《照邻兄奕园燕集得寒字》七律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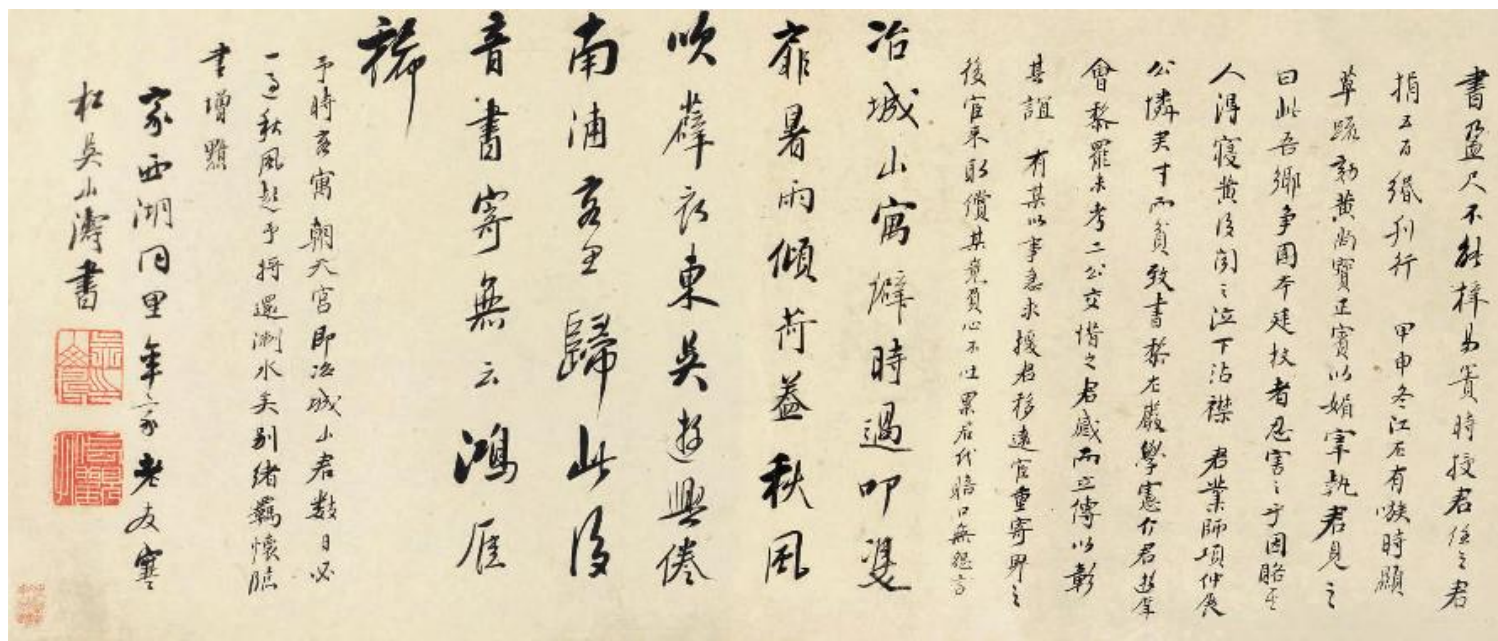
崇祯七年（1634），业师项声国“怜君才而贫”，想通过友人黎元宽介绍孙丕璫“游庠”，后虽未果，但孙丕璫还是“感而立传以彰其谊”。黎元宽在《项声国传》也提到了这件事，并致以歉意。自注中还讲到孙丕璫曾替朋友还债，口无怨言。

最后一处自注记述两人在南京的交往。吴山涛说：“予时客寓朝天宫，即冶城山，君数日必一过”，知吴氏客居在南京朝天宫，与孙丕璫居住的朱雀桥相距不远，孙丕璫过几天就要来一次。秋风起，吴山涛准备回浙江，“东吴游兴倦，南浦客思归”，故赠诗六章，以为纪念。并言彼此勿断联系，“此后音书寄，无云鸿雁稀”。

这其中，需要详细说明的是孙丕璫的父亲孙光宗。钱谦益应孙丕璫之请为撰《海阳孙徵士照邻墓表》（以下简称《墓表》），之后查士标又应孙丕璫所请手书《海阳孙徵士照邻先生墓表》（对钱文略有增补），并录黎元宽、方以智题跋。这篇《墓表》与《奕园杂咏·奕园史》对于探讨休宁草市孙家及与当时文人名士的交往，有重要的价值。

孙光宗，字照邻，号石邻居士，安徽休宁草市人。好从贤豪长者游，嗜好山水、诗画、游戏、篆刻。家本有荆园，因园归伯父，便自辟奕园，与诗人、戏剧评论家潘之恒唱和其中。又负笈吴越间，与王穉登、葛一龙、范汭、李流芳诸人“班荆投分，名纸刺门，无一俗子”。当时名人题咏奕园者很多，“海内名卿钜公，搦管操觚之士为序、记、颂、赋若干首，为诗、歌、杂咏若干首”^[13]，俱刻入《奕园杂咏·奕园史》。

奕园内景色众多，有芳露堂、清友亭、西堂、寄谿、珠虞榭、满月轮、振羽、香粟区、梦公步、冰肌坐、玉脂堂、清酣室、琅嬛库、息机、兰生室、登



吴山涛 赠孙韞生先生六章手卷(之一) 纸本 27×229.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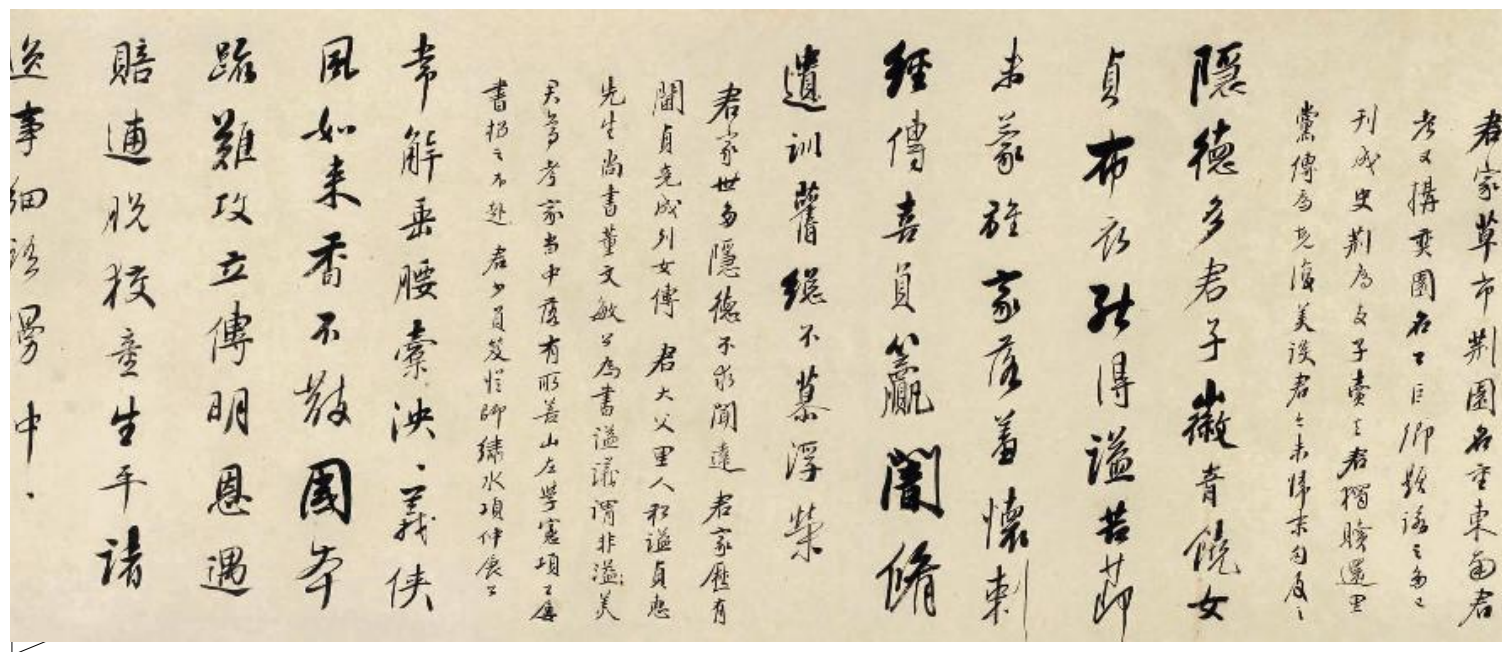
丰场、银汉槎、羽人之馆、见思阁、睡仙亭、罗浮馆、疏影廊、韵廊、泽芝槛、药房、洗妆楼、分霄、旷圃、寒烟、松门、凤嬉坪等。李维桢撰有《奕园记》^[13],解释了园中景色命名缘由。王穉登在《玉脂堂赋》中提到谢陞所作《奕园记》“夸艳其胜,几与弇园、淡圃相埒”^[14]。《奕园杂咏》中有吴之俊《奕园二十二咏》,黄习远《奉和照邻兄奕园三十一咏》,郝之玺《赋奕园六言诗三十咏》,潘之恒《重游奕园诗》二十八首、《奕园新咏十三体》,陆君弼《奕园十三咏》等,从诸名家杂咏,可以想见奕园景色之胜。

据《奕园杂咏·奕园史》,知曾至奕园并赠诗文者,计有黄虞龙、潘之恒、吴之俊、黄习远、郝之玺、钱希言、范汭、毕懋康、朱鹭、程嘉燧、陆君弼、赵宦光、冒愈昌、吴兆、王人鉴、王醇、米云卿、张嗣功、翁立用、范文熙、洪云、吴梦旸、赵昌期、项德棻(后改名项梦原)、周之德、郑琰、谢室、谢彦章、邬嘉文、孙明见、闻人惠光、何璧、葛一龙、申用懋、谢陞、黄正宾、吴文龙、王寅、王穉登、吴之鲸、李维桢、朱谋玮、蓝文炳等。可见东南才俊,无不与之交游。

钱谦益在《墓表》中提到,孙光宗卒后,孙丕璫本想请程嘉燧写墓石。《奕园杂咏》中即有程嘉燧万历四十二年(1614)所撰《奕园歌为孙照邻作》。但因程氏已故去,所以没有写成。转请于林古度,林古度为孙光宗撰《行状》。然后再求于钱谦益,因孙丕璫的老师项声国是钱谦益的门人,加上陈允衡之请,钱谦益便依据林古度所撰《行状》写下了这篇《墓表》。钱谦益在《墓表》开头也讲到了这段插曲,并回忆了他对程嘉燧的敬重与深情:“余盛壮为文章,以孟阳为砥砺。孟阳之期待余者不轻,而余之自视,不敢以不重。”

钱谦益所撰《海阳孙徵士照邻墓表》收录在《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五。今刊本中,有1994年钱仲联标校、整理本^[15]。其中“人子之欲不死其亲,可谓至于斯极者矣”有校记:“邹铤序本、金匱本作‘可谓至’,邃本作‘至谓可’”。究竟哪个本子说的对,由于查士标手书的《海阳孙徵士照邻先生墓表》为孙丕璫所请而写,故原稿应为“至谓可”。

《牧斋有学集》康熙三年(1664)刻本中,《墓表》在说到孙光宗家世时有阙文:“孙君讳光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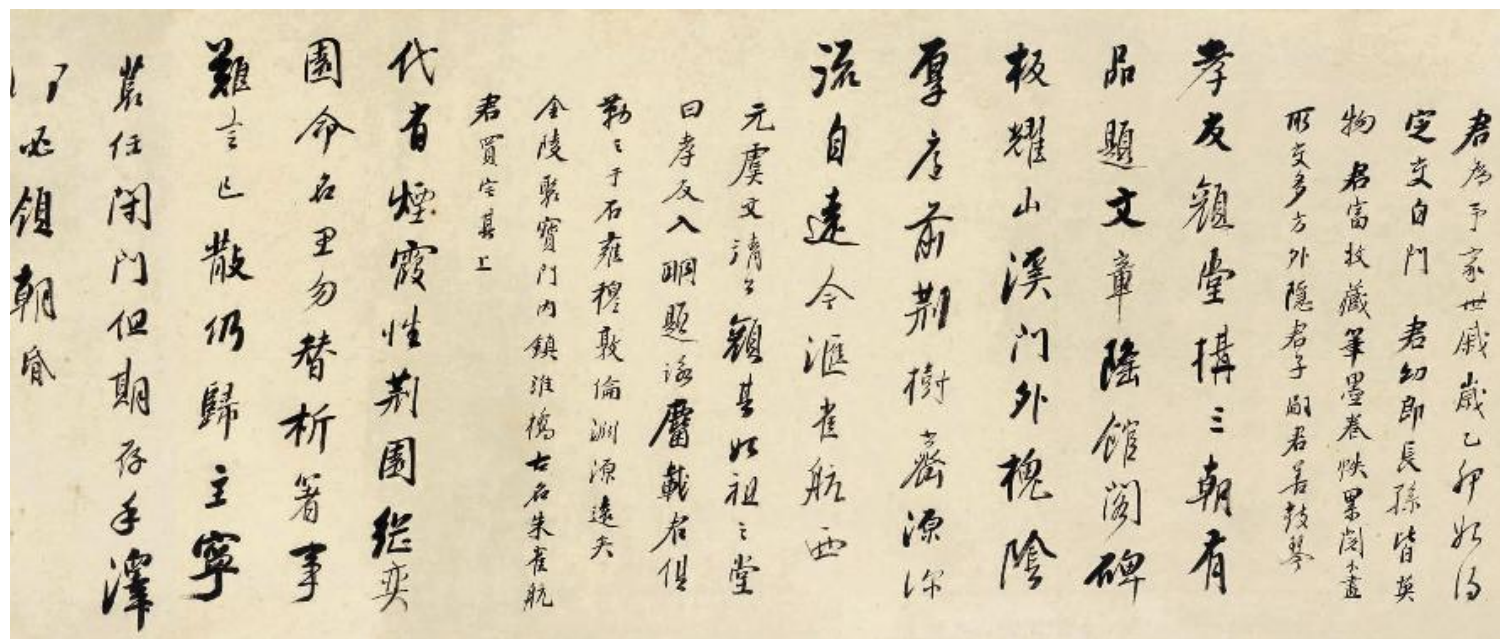


字照邻，唐金吾上将军之裔，而贞惠公口之子也”，今刊本亦如是。而查士标手书本中不阙，称为“贞惠公汝庭先生之季子也”。汝庭先生，即孙承训，字少竹，“天性慤真，树奇节，意不在豪举，而以荆游于兄弟”^[10]。卒后谢陞为其撰《诔文》。“唐金吾上将军”即孙万登，山东青州人。唐咸通五年(864)，任金吾上将军；后奉诏讨贼，兼镇新安；咸通七年(866)凯还，“帝甚嘉之，赐第黎阳乡之唐田，始居新安，敕赠新安伯，谥忠勇”^[11]。唐田孙姓蕃盛，至明末已传二十多世。到孙承训时，因其父“未尽其天年”，故“长君(承训)当室，则以儒服贾，修累世之业”，孙承训在父亲故去后为全家而操劳。孙承训死后被私谥为“贞惠”，孙光宗所建的贞惠祠即在奕园中，由李维桢撰《孙贞惠祠记》^[12]。吴山涛《赠孙韞生先生六章》还提到了董其昌曾为孙承训书《谥议》。

关于孙光宗故去的时间，钱谦益的《墓表》书于顺治十八年(1661)，查士标书《墓表》的时间又在其后。程嘉燧卒在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所以来不及为孙光宗书《墓表》，钱谦益在《墓表》中也说：“(程嘉燧)去今十九年矣”。则孙氏卒年，也应在崇祯十六年(1643)。

查士标手书《墓表》后，录有黎元宽、方以智跋。黎元宽为项声国之友，在《项声国传》中赞孙光宗为“休宁潜德君子”。方以智的诗跋也是应陈允衡之请所书，诗曰：“唐田草市隐者雄，绍衣蕴义生春风。让园辟园留诗翁，不屑少伯为朱公。此一语，不雷同，诒孙有谷何愁穷，苦心观者称良工。人子欲不死其亲，好友送笺来孤峰。铭者题者半作古，贞珉不坏干戈中。即此供养人间世，不见法华眉毛光向东”。方以智对孙光宗让园辟园之事亦持肯定态度。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孙丕璨的收藏。吴山涛在手卷第一处自注中说他“富收藏，笔墨卷帙，累阅不尽”，可见他的收藏之富。但具体名目，除程正揆《山水册》、髡残《绿树听鹈图》外，暂无从查考。因孙光宗师从项梦原，孙丕璨师从项声国，项梦原的收藏不乏宋元名迹；项声国收藏不详，但项声国之兄项鼎铉收藏颇丰，与董其昌、李日华都有来往；因此，孙丕璨的收藏或许就受了项家叔侄的影响亦未可知。程正揆在自题中不仅说孙丕璨“鉴赏具眼”，还提到“平日虚衷嗜古，不强索笔墨之获”，确实称得上是一位“高远有致”之人。



《赠孙韞生先生六章》与《海阳孙徵士照邻墓表》都是应孙丕璠之请而写，正是借这两件手卷，对孙光宗与孙丕璠父子的认识才变得如此真切；对吴山涛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认识；更对明末清初的文人交往提供了一份难得的明证。

附录

吴山涛《赠孙韞生先生六章》

其一

世谊陈雷久，交君赠稿新。
人间留硕果，席上数家珍。
书画娱嘉客，琴桥洽隐沦。
不图当此日，犹得见先民。

（君为予家世戚，岁乙卯始得定交白门。君幼郎、长孙皆英物。君富收藏，笔墨卷帙，累阅不尽。所交多方外隐君子。嗣君善鼓琴。）

其二

孝友颜堂构，三朝有品题。
文章隆馆阁，碑板耀山溪。
门外槐阴厚，庭前荆树齐。
源深流自远，今汇雀航西。

（元虞文靖公颜其始祖之堂曰“孝友”。入明，题咏麇载，君俱勒之于石。雍穆敦伦，渊源远矣。金陵聚宝门内镇淮桥，古名朱雀航，君买

宅其上。）

其三

代有烟霞性，荆园继奕园。
命名思勿替，析箸事难言。
已散仍归主，宁荒任闭门。
但期存手泽，何必领朝昏。

（君家草市荆园，名重东南。君考又构奕园，名公巨卿题咏之多，已刊成史。荆为友子卖去，君独赎还，里党传为克复美谈。君今未归，末句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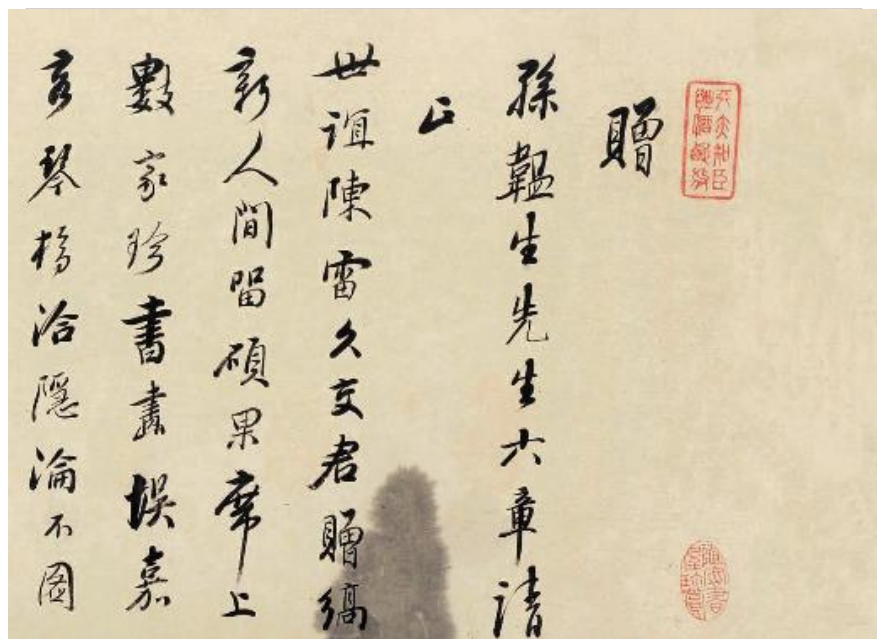
其四

隐德多君子，徽音饶女贞。
布衣能得谥，苦节未蒙旌。
家落羞怀刺，经传喜负簪。
闇修遗训旧，总不慕浮荣。

（君家世多隐德，不求闻达。君家历有阍贞，竟成烈女传。君大父，里人私谥贞惠先生。尚书董文敏公为书《谥议》，谓非谥美，君尊考家当中落，有所善。山左学宪项公屡书招之，不赴。君少负笈，从师绣水项仲展公。）

其五

常解垂腰橐，泱泱义侠风。
如来香不散，国本疏难攻。



立传明恩遇，赔逋脱狡童。

生平诸逸事，细语漫冲冲。

(少府唐宜之公所纂内典名《如来香》，书盈尺不能梓，易簧时，授君任之，君捐五百缗刊行。甲申冬，江左有喉时显草疏劾黄尚宝正宾，以媚宰执，君见之曰：“此吾乡争国本廷杖者，忍害之乎？”因赂其人得寝，黄后闻之泣下沾襟。君业师项仲展公，怜君才而贫，致书黎左严学宪，介君游庠。会黎罢未考，二公交惜之，君感而立传以彰其谊。有某以事急求援，君移远宦，重寄畀之，后宦来取偿，某竟负心不吐。累君代赔，口无怨言。)

其六

冶城山寓僻，时过叩双扉。

暑雨倾荷盖，秋风吹薜衣。

东吴游兴倦，南浦客思归。

此后音书寄，无云鸿雁稀。

(予时客寓朝天宫，即冶城山，君数日必一过。秋风起，予将还淞水矣。别绪羁怀，临书增黯。)

家西湖同里年家老友寒松吴山涛书。铃印：天亦知臣诗酒疏放、吴山涛印、岱观父

(作者单位：北京匡时书画部)

注释：

[1] 汪世清《吴山涛〈西塞诸诗〉册》，《故宫学术季刊》，第18卷，第3期，第179-192页。

[2] 见《如来香》书末孙丕璫跋(明)唐时，《如来香》(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七辑，第13册)。

[3]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四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4]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四册，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248页。

[5] (明)汪道昆《荆园记》，《太函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第1347册)，卷七十七，第642页。

[6] (明)孙光宗《奕园杂咏·奕园史》，明万历刻本。

[7] (清)钱谦益《海阳孙徵士照邻墓表》，《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五，清康熙三年(1664)，邹铤刻本。

[8] (明)李日华《项宪副希完六十寿序》，《李太仆恬致堂集》卷二十一，明崇禎刻本。

[9] 《嘉禾徵献录》卷五“鼎铉声国”条记载“辛未成进士，甲戌廷对”有误；据黎元宽《项声国传》与《明清进士题名录索引》，项声国应为甲戌(1634)进士。

[10] (清)黎元宽《项声国传》，《进贤堂稿》卷十七，清康熙刻本。

[11] (明)唐时《如来香》(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七辑，第13册)。

[12] (明)潘之恒《奕园史序》，《奕园杂咏·奕园史》，明万历刻本。

[13] (明)李维桢《奕园记》，《大泌山房集》卷五十七，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本。

[14] (明)王穉登《玉脂堂赋》，《奕园杂咏·奕园史》，明万历刻本。

[15] (清)钱谦益《海阳孙徵士照邻墓表》，《牧斋有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卷三十五，第1246页。

[16] (明)吴之鲸《奕园史序》，《奕园杂咏·奕园史》，明万历刻本。

[17] 《新安始祖孙万登小传》，《孙氏宗谱世系研究》，(苏州：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1996)，(二)孙氏支系，第229页。

[18] (明)李维桢《孙贞惠祠记》，《大泌山房集》卷五十六，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本。

文彭年表(三)

□刘东芹

1553年 嘉靖三十二年 癸丑 57岁

●此年,范大澈携京师所购《泉帖》,至吴门求文徵明鉴定。(范大澈《碑帖纪证·泉帖》,《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1994,第47册,第428页。)

●暮春,刻《茂林修竹》正方细白文印,边款:嘉靖癸丑暮春,兰亭返棹,客松月轩。鸟鸣深树,花落闲窗,乘兴而篆,三桥文彭。(黄尝铭《篆刻年历》。)

四库本《博士诗集》卷下有《至山阴》:山阴城中花欲舒,山阴城南锦不如。秦碑禹穴犹在望,兰亭刻曲成丘墟。春光虽已足游赏,胜地无奈空踟躇。等闲世事竟陈迹,千载悠悠北伐书。

《登戴山》:夙慕山阴胜,千峰罗翠屏。探奇窥禹穴,读记想兰亭。俯仰悲今昔,烟霞本性灵。空馀戴山庙,谁写换鹅经。

《镜湖》:镜湖湖水如镜平,峰峦罨画摇空明。浮云暖澹自来往,轻舟迅迈劳相迎。白鸥双双映山远,青蒲曲曲随舟生。风流贺老已千载,转忆悠悠身后名。

●暮春二十八日,作隶书《赤壁赋册》。纸本,高一尺一寸四分,宽六寸一分,前赋为寿承书,字大径寸,计八十六行。落款:嘉靖癸丑暮春廿又八日,文彭记。

后接彭年书《后赤壁赋》,落款:娄江兄既得文三桥所书坡翁《前赤壁赋》,复邀余书此,三桥以能书擅名当世,尚未能得翁仿佛,况余之拙劣而未学者耶。谚云:一解不如一解。正此谓也!临楮不胜惶恐,时丙辰夏五晦,彭年。(见陶樾《红豆树馆书画记》卷六《明文寿承彭孔嘉书前后赤壁赋册》,《续修四库全书》第1082册,第307页。)

●四月八日,过无锡华夏真赏斋,尽阅华氏所藏法书名画,录文徵明《荐季直表跋》、《袁生帖跋》、《唐人双钩晋右军而下十帖跋》三文于古纸拓《真赏斋帖》后,并作跋云:“嘉靖癸丑四月八日,过东沙真赏斋,见此帖,喜其异于他本,乃知用古纸拓成者,良可爱也。是日绿阴清昼,庭无杂宾,新茶初熟,尽阅所藏法书名画,恍然不知有身外事。昔东坡谓静坐一日如两日,不知今日之适,当作几日也?文彭记。”(容庚《丛帖目》,第1册,第217页。)

●六月既望,为章杰(子俊)所摹刻的《二王帖选》作跋语:“米南宫云,学书不入晋人格辙,终成下品。然真迹世所罕见,而法帖中真伪相杂,虽《阁帖》为石刻之祖,已有此目。而转相摹刻,不胜舛讹,余每病之。至于《兰亭》,尤为书家聚讼,桑世昌《兰亭考》可见已。章子俊偶

得兰亭古本,后有姜尧章题字云‘曾经山穀老人鉴定’,尧章于《兰亭》最为精详,当为佳本无疑。《黄庭》则越州石氏本,《告墓》则《宝晋》,《宣示表》则《淳化》,而大令章草《洛神赋》世无别本,旧为吾苏王氏世藏,元人题识甚多,其《乞假》、《辞中令》则雪溪堂本也。摹拓精工,不差毫发,丰南禺先生定为二王帖选,学书者以此入门,当无他歧之惑也。”此帖为长洲章杰刻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收羲之、献之书,各为一卷。(见容庚《丛帖目》第3册,第1136页。)

●七夕后二日,作小楷册页《七律》,款云:“病目久不作细书,殊不成字也。癸丑七夕后二日,文彭书。”(李佐贤《书画鉴影》卷十五《明人书画扇面集册》,《续修四库全书》第1086册,第33页。)

●九月,作《名高柱史》印,边款:嘉靖癸丑秋九月,篆于得月榭。三桥彭。(顾湘纂《小石山房印苑》卷一。)

●秋,在南京,为梧江藏《张弼草书诗卷》作跋:“癸丑(1553)秋日至金陵邂逅梧江,出示敬题于后,后学文彭书。”(见1996年佳士得秋季拍卖会图录。)

●此年,吴国伦过吴门,与文徵明父子、许初、彭年等人订交。吴国伦《吴门忆旧有序》:忆在嘉靖癸丑,予过吴门,尝得与文氏父子暨陆子传、许元复、彭孔加诸君游,今来已逾三十年,诸君凋谢殆尽,而所与游者皆新知也。(《甌齔洞藁》卷十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350册,第255页。)

1554年 嘉靖三十三年 甲寅 58岁

●六月,倭寇掠苏州。(《明史记事本末》卷五十五。)

●八月,文徵明为张情作《少峰图》。情字约之,嘉靖十七年进士,仕至福建兵部副使。张情子张应文,字茂实,与文彭、文嘉往来甚密。张应文子张丑,撰有《清河书画舫》。

张丑云:“先子茂实与寿承、休承称莫逆交,故评定国朝名公书画,万不失一。”(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十二上,四库全书本。)又云:“我祖约之(张意)、叔祖诚之(张情)并承庭训,互相师友,后先成进士,登甲科,与徵仲先生为莫逆交,其长公寿承、次公休承、向先子茂实,称通家姻娅,朝夕过从,无间寒暑,寻源溯流,订今考古,一时家藏珍图法墨甲于中吴。”

●八月十九日,作草书诗卷,落款:甲寅八月十九日书,文彭。(北京瀚海1997年秋季拍卖会图录。)

●九月间,陆治作《浔阳秋色图》,文彭书白居易《琵琶行》(隶书)于后,跋曰:“叔平丈作《琵琶行图》,予为书歌于后。书虽拙,附叔平丹青以传,则予有大幸矣。”(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090册,第384页。)

●约在此期,又以隶书跋陆治《垂虹别意图》:“乱云如海涌晴山,太古峨眉杳霭间。谁似萧然林下客,静看流水意俱闲。文彭。”(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090册,第384页。)

●秋日,作《笔花》印,边款:甲寅秋日,文寿承篆。(顾湘纂《小石山房印苑》卷一。)

●腊月,题《石湖春晓》于彭年自撰书《冬游石湖记》。(黄裳铭《篆刻年历》。)

●侄文元善生。

1555年 嘉靖三十四年 乙卯 59岁

●二月,书自作《渔父词卷》。(黄裳铭《篆刻年历》。)

●五月,《停云馆帖》卷九“元名人书”摹勒上石。

●六月,倭寇进犯苏州,“举火焚枫桥六昼夜”。

●约在七月,文彭藏赵子固《墨兰图卷》,王穀祥、朱曰藩、周天球、彭年、袁褰先后作跋。

此年六月王穀祥作跋。

七夕前两日,袁褰作《题文子寿承所藏赵子固墨兰二绝》:昔赏彝斋画水仙,花枝盈卷烂云烟。风流已去多珍袭,又见兰蕤造墨玄。子固当年称画师,黍离宗国不胜悲。滕王蛱蝶图还在,墨吐幽香赋楚累。嘉靖乙卯七夕前二日,汝南袁褰书于城寓之花谷。

●八月六日,陆师道又题:高人逸士多能以书法绪馀作墨戏,若文石室与可、赵彝斋松雪二王孙,僧温仲言皆超逸绝尘,望之可知为神品,其余以春蚓笔作风中柳,虽工如崔白、赵昌,达人不赏也。往于衡山先生处见湖州集贤竹枝、日观葡萄,先生指示笔法,率与篆籀草书合。今复于寿承所观子固墨兰,行笔破墨,若出一轨,益知书画无二源也。先生父子,书名冠一代,岂非山谷所谓能以画法作书者耶。八月六日,陆师道题。(以上均见吴升《大观录》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066册,第672页。)

●八月,徐中行奉使北还,过吴访文徵明。文彭后在北京与其有交游。

●约八月,又有致文嘉《别后帖》托徐中行带至金陵,文嘉此时在南监,与何良俊、张之象、盛时泰交往颇密。(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第264页。)

文彭《别后帖》云:“别后,周木泾乃郎行,曾寄书去,想已知之矣。府中遗才有四郎名字,四郎坚意不出,托之于病。盖府中不考,止开三等已前几名。平昔抱负几名,乡官子弟几名,行优几名,四郎在乡官弟子之列,盖因盘缠难措置。苟可以中,虽下科亦无妨也。闻各学生员,必得学官到日,方许入城,不知果否?近来倭寇声息颇缓,当不致十分琐琐也。徐默川又当了五分粮长,丁景山再三秉复莫公,只是不准。又闻默川乃郎亦不甚推却,如何,如何。兹因徐子行便,草草附及,兄彭白。休承弟。盛云浦画极其精妙,区区亦颇有力焉,烦为致声。(见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徐邦达集》第七册,第

1057页。)

●闰十一月,作小楷书《封礼部主事一诚徐公行状》,文不录。故宫博物院藏。款曰:嘉靖乙卯闰十一月,文彭书。又识:剑石徐君,以其曾祖一诚翁状,命仆重录一过。以一诚翁之德,海口翁之文,非区区恶札所当厕其间者,特以剑石之请,有不可辞耳。虽然,祖宗之德,非文不传,而非后人以有以绍述之,则亦终归泯没而已。剑石此举,不亦可嘉乎。文彭题。(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徐邦达集》第七册,第1054页。)

●此年,塾师钱尚仁告归,文家与钱尚仁关系持续五十年之久,父文徵明作画并题诗钱行:

五十年来宾主情,忍看执手别柴扃。秋风寂寞陈蕃榻,荒草依然茂叔庭。千里来去总白头,一樽相对眼犹青。临行为写吴枫冷,何日高踪再此经。德孚弘治间处余西塾,自是往来,今五十年矣。将归,出旧作相示,因次韵饯行。嘉靖乙卯,徵明。(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卷十《明文衡山吴枫送别图立轴》,中华书局铅印本,1937年。)

1556年 嘉靖三十五年 丙辰 60岁

●春日,作《凤凰池上客》印,边款:嘉靖丙辰春日,长洲文彭篆。(顾湘纂《小石山房印苑》卷一。)

●二月朔后五日,在虞山,刻《时还读我书》,边款:嘉靖丙辰春二月朔五日,寓虞山西郊精舍,风日暄和,放笔作篆并识,文彭。(见顾湘纂《小石山房印苑》卷一,又见嘉德2003年秋季拍卖会图录。)

●春二月,《停云馆帖》卷十“国朝名人书”摹勒上石。

●八月,题文徵明《古洗蕉石图轴》云:嘉靖丙辰秋八月望日,三桥居士文彭书于金台石室中。(《石渠宝笈》卷十七,四库全书本。)

●秋,项元汴得张雨《自书诗册》于文衡山家。《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卷末项元汴跋:张贞居墨妙帖,共计六十二纸,后连名人题跋一册,计三十人,墨林识,嘉靖三十五年秋日,得于吴趋文衡山家。按:刘九庵在《元两件书法作品的辨伪》(《文物》,1998年,第2期)一文中,断定此本是文彭以临本掉包真迹的伪书,理由有三:一、该册风格与张雨不类;二、册中无文氏家族跋记,似不合常理;三、张雨印记伪。暂附于此。

●小至日,朱曰藩为文彭藏赵子固《墨兰图卷》作跋:“郑所南写兰不著土,人扣其故,曰土被靺鞨抢去。予意写兰正不需著土。观子固下笔,自有尘外之韵,著土则著相矣。维摩诘所谓尽舍利佛力,去此天所散华不得也。寿承以为何如?丙辰小至,射陂朱曰藩书安福邸舍”。(吴升《大观录》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066册,第671页。)

此卷文彭又曾请周天球题跋:“素葩垂露香堪挹,劲叶含风翠不凋。瞥向图中见清影,每于尘外想高标。昔人谓作兰竹须用书家八法始得臻妙,故善写生者多不能此。彝斋高致,载籍中常有之,盖不独以绘事名者。观文伯子寿承所藏墨兰,亦概见矣。伯子赏鹭古今法书名画,称具法眼,而于此卷珍重之,殆以是与。周天球识”。(同上。)

注:朱曰藩,字子价,号射陂,宝应人,朱应登之子。生卒年不详,约明世宗嘉靖三十年前后在世。登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官九江府知府。曰藩隼才博学,以文章名家。有《山带阁集》三十三卷。

●大约在此年,左眼患疾。

1557年 嘉靖三十六年 丁巳 61岁

●春,初至京,以岁贡生入礼部试,长子文肇祉(1519—1587)随行,廷试第一。文彭有《初至京》诗:旅食到京华,春深何处花。感时空老大,独坐每兴嗟。素乏资身策,新添罩眼纱。出

门三阅月,无日不思家。另,《廷试述怀》诗:少小习章句,朝夕亲笔研。词场十度游,终迷五色线。行行预计偕,迢迢入畿甸。皇畿本佳丽,瑞霭郁葱蒨。五城十二楼,紫陌韶华遍。披褐朝至尊,复道随群彦。步趋白玉阶,日射黄金殿。螭头绕炉烟,雉尾开宫扇。操笔陈芜词,来上宸旒献。虽非仲舒口,不待常何荐。但愿纳刍荛,自忘草茅贱。(文彭《博士诗集》卷下,《文氏五家集》卷七,四库全书本。)

文彭此次北上,丰坊、皇甫汈亦有诗相赠。

丰坊《送文寿承北上》:南国知名久,徵书及此时。文章传叔党,翰墨寄羲之。去得青毡旧,归膺彩服宜。相望烟水阔,何处柳丝丝。(《万卷楼集》卷五,明万历四十五年刊本,第四页。)

皇甫汈《送文司教北上》:当宁崇儒教,持经谒圣君。伏生犹未老,扬子最能文。帐已同南郡,书堪逼右军。还怜竹林后,见尔出鸡群。(《皇甫司勳集》卷二十二,四库全书本。)

●二月二十五日,得到将赴嘉兴任的消息,有致钱穀一札:“沈玄洲家人并曹清来,两承华札,甚慰远怀。区区事体,大率如此,冢宰公已面许嘉兴,但未及与楼老、存渠三公言耳。□□本等教职,必不许多人情。但不往一说,反或见怪,所以只得开口,甚非区区疏懒所宜。若果得南归,其乐何如?日来收得之城王牡丹四幅,精而价廉可爱。又收吴兴沈士偁临董源《春蛟起蛰图》,笔力虽弱,亦可以想见北苑规模,归时当共赏鉴也。赎画事何齟齬如此,令人气忿。昨来已嘱之剑泉,今剑泉适又被论,当必更有处也。相见在途,诸不能一一,前日有小画寄归,想亦见之,未得评语,不识以为如何?玄洲家人要往河南,此书至时,想仆亦将发棹也。二月二十五日,彭顿首。叔宝老弟足下。老皋两日颇有兴头,皆尔翁之力也。(《明代名人墨宝》,上海书店,1995年,第108页。)

●四月初,有致彭年一札,言及嘉兴府学一事发榜已定:“两日前人说是秀水,到开榜日



文彭 题陈淳墨花册 纸本 上海博物馆藏

始知嘉兴府学，故尔误书，凡事必待到手方是，所谓前程如漆，岂不信夫。一笑一笑。四月朔日再书，隆池尊兄先生”。（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卷十三《文寿承尺牍册》，道光二十年刻本，第3页。）

按，周振鹤《释江南》：嘉兴府时辖嘉兴、秀水、嘉善、崇德、桐乡、平湖、海盐七县。

●归家，下年赴任。文彭《出京承徐相公赠诗次韵酬谢》：五云楼阁九重城，瞻望何殊万里程。调化共知歌盛德，好贤端不为修名。平生雅度真难值，此日新诗更有情。潦倒穷途甘弃掷，独惭虚誉动公卿。《梦还家示肇儿》：离京才二日，已有梦还家。亲戚多情话，风尘感岁华。共怜须鬓改，不觉道途赊。月落鸡声早，依然天一涯。（《博士诗集》卷下，《文氏五家集》卷八，四库全书本。）

●七月四日，文徵明作小楷《岳阳楼记》，为杜子庸所得。因落款丁巳误作丁丑，文彭为之题正。

《岳雪楼鉴真法帖·岳阳楼记》款：嘉靖丁丑七月四日，徵明书，时年八十有八。文彭跋：家君特喜小书，愈小愈精。此《岳阳楼记》，其尤精者，子庸得之，珍爱不已。但丁巳误书作丁丑，

因命题正，谨记于后。男彭拜手书。（见《文徵明年谱》，第681页。）

●九月，刻《连娟二华顶，空洞三茅腹》印，印左侧款云：嘉靖丁巳九秋，游西山至白云泉，陟天平绝顶，石林岬岬，邱壑离奇，恍若别有天地。归而案头适有此石，因取东坡《仇池石诗》二句，镌以纪兴，三桥。（《钦定石渠宝笈三编》御书房藏一《九峰歌二

十韵题文彭刻冻石砚山章》，《续修四库全书》，第1079册，第249页。）

●此年，为父文徵明代笔，为华夏《真赏斋帖》所收《万岁通天帖》作跋刻石。（据周道振《文徵明书法伪作考（续）》，见《书法丛刊》总68期。）

另有致华夏札，暂系于此：别来忽复三月，多事，未得闲暇。所委遂尔迟滞，极深惭悚。今已完其八，尚有两卷，一二可毕事，使者且令先归，上已前后为奉纳也。草草附复不次。彭顿首，东沙尊兄先生。（此为华氏后人捐赠无锡博物院藏，见《书法》2013年第11期。）

●跋文嘉《松溪祝寿图轴》，此图后有文徵明、王穀祥、许初、文嘉、陆师道等人题诗。文嘉自题：“嘉靖丁巳十月六日，茂苑文嘉为隆池写寿近溪先生。”文彭题诗中说：“与子同庚月较迟。”（上海中天拍卖公司图录。）

●仲冬，作《江风山月》白文印，边款云：嘉靖丁巳仲冬篆，文彭。（顾湘辑《名印传真》卷一。）

1558年 嘉靖三十七年 戊午 62岁

●此年在嘉兴。道光本《嘉兴府志·官师》：

嘉兴府训导,嘉靖,文彭,戊午任。

文徵明《甫田集》(四库全书本)卷十五《送彭赴嘉兴训导》:清时一命忝师儒,百里邻州接里闾。志养于今欣有禄,官贫莫叹食无鱼。微名聊足酬初志,多暇何妨读旧书。九十老人须在念,频频书札问兴居。东望嘉禾近百程,漫随儒牒去亲庭。蝉联宦业承三世,辛苦传家有一经。我老自怜衰鬓白,汝行不失旧毡青。还应别后钟情处,飞梦时时秀水亭。

徐阶《司训文三桥赴嘉兴》:嘉禾地接阖闾城,来往风帆一日程。几杖高堂常在望,文章邻郡久知名。谈经士服传家学,请外人怜陟岵情。遥识兹行能自适,广文何必羨公卿。(徐阶《世经堂集》卷二十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0册,第180页。)

●长子文肇祉入太学。文徵明作《肇孙北行》:阿翁九十苦钟情,倚杖那堪送汝行。璧水去游天子学,春风须听上林莺。壮途初发千山轭,雅志无忘万里程。三百年来忠孝在,慎言无溃旧家声。(文徵明《太史诗集》,《文氏五家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按:文肇祉以诸生入太学,十试有司,不利。就选上林苑录事,诗文草隶,仿佛寿承。

●跋马和之《周颂十篇图卷》。(黄尝铭《篆刻年历》。)

●长至(即夏至)前,为子重作《淡墨风竹》,后与沈周白描枇杷装为合璧小轴。款云:“戊午日长至前笔,三桥文彭”。(方濬颐《梦园书画录》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086册,第459页。)

●端阳后二日,在嘉兴,有致彭年一札并附诗。诗云:玉质金鳞锦不如,相依碧藻映清渠。书斋尽日无人到,看尔洋洋乐有馀。文鱼潏潏泳方塘,火齐珊瑚映截肪。移向益池看不厌,此身何必在濠梁。乞得金鱼样数多,红红白白戏清波。献珠仙女将军印,玉树金花界地罗。杨妃沉醉锦披头,锦被牙床色更优。鹤顶丹砂朱络索,一时声价遍遐陬。五色吴笺胜陟厘,端州

贡砚墨花垂。试拈阁帖闲临学,不是羲之即献之。山水平生兴不孤,嘉禾惟有水平铺。不须刻木如朱子,自是营邱设色图。黄鸟啼春昼长,纸屏矮几竹匡床。熏炉香烬茶瓯歇,挂起南窗纳晚凉。近作书去发一笑,学中掌教欲求旧作一二首,千万立挥为妙,馀情种种不能道。前日王鹤梁来,知起居嘉胜,甚慰。徐侯更息不备。彭顿首,隆池尊兄。端阳后二日。(《钦定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元明书翰》,《续修四库全书》第1078册,第575页。)

●六月三日,在项元汴之退密斋作草书沈约《修竹弹芭蕉文》,落款云:“嘉靖戊午六月三日,戏书于墨林之退密斋,三桥文彭记。”此幅作品被项元汴加以千文编号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9册,文物出版社,第96页,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品。)

●六月九日,再过项元汴书斋,书晋张敏《头责子羽文》,落款云:“越六日,再过墨林斋,又复戏此,将以掩前之丑,而奉不可掩。所谓一蟹不如一蟹,一笑弃之可也。三桥文彭记。”(此与前书并称《傲园杂兴诗册》,均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六月十九日,有致无锡华世祯札:“彭顿首奉复,西楼世契兄执事。彭自京中归,正值吾兄病危之日,每欲买舟一造,碌碌两月竟不得果,负罪殊不可逭。蒙不鄙弃,远承华札,兼辱佳贶,令人愧赧无已。几杖之赐,不是过也。仆在此,虽是清淡,亦足以度日。所喜近日添一曾孙,在区区不足为重轻,而家君已见五代,为足庆耳。非世契不敢奉报。外鸿山、东沙二帖,烦从者转致,万万息香伴緘。馀情种种,不能悉。彭顿首。戊午六月十九日谨空。(此札为华氏后人捐赠无锡博物院藏品,另有文徵明致华世祯数札,均见《书法》2013年,第11期。)

华世祯(1482-1566),字善卿,号西楼、湖桥生。

●九月十日,致少偕老兄札:别来许久,每

询动静,知常卧病,岂享清福太过耶!瓦炉竹榻,沙壶建盏,明窗净几,门无俗客。仆梦寐中未尝不在此二小室也。一行作吏,此事尽废,诚非虚语,如何如何?虚室雅谑,少室博古,时时往来于怀。忙中不及作书,幸道此意。往在京师见兄与华山书,千言万语,有胜见面。望不憚翫缕,时惠一纸何如?彭顿首白事。少偕老兄。戊午九月十又一日。(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牋·第二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九月十一日,有礼致朱朗,为其祝寿并求其画。云:恭喜贤夫妇皆已五十,道远不能趋贺,欲作一诗,而疏懒未能就绪,敢以银一星代之。所谓五言诗,不中还债,一笑一笑(云履并上)。寄去金鱼四枚,白尾二,黑眼二,皆佳种也,幸亮入。向以素册求作戏墨,须精致为佳,而尤以简笔为尚,使区区易于仿效也。至祝至祝。更欲烦君作花卉四幅:一水仙、梅、山茶;一牡丹、桃花;一葵、榴;一芙蓉、菊花。须西室有诗者为妙。止用三尺绢,稍长些作四幅,必要设色者,再停数日寄银买绢也。预此申恳。尊夫人诞日,拙荆具粗帕薄仪,并望转达,彭顿首,子朗老弟足下,戊子九月十一日。(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牋》第二册,第42页。)

●九月二十三日,为项元汴所藏《宋度宗手敕赵子固卷》作长跋:“右《告身》一通,宋度宗咸淳五年书授宗室赵孟坚者。坚字子固,别号彝斋居士,善白描梅兰竹石,犹长于水仙。博雅好古,鉴赏精绝,人比之米南宫。东西游适,惟一舟横陈,仅留一榻为偃息地,余所携皆平生好玩之物,意到则随左右取以口弄,殆忘寝食,过者望而知其为子固书画船也。尝宝《定武兰亭》一本,过长荡湖,舟覆,立浅水中,手持《兰亭》,呼曰:‘《兰亭》在此,余不足惜’,其雅致如此,可想见其人也。公登宝庆丙戌进士,至咸淳己巳已四十四年,而所授止承信郎,盖其清修自适,恬于进取,不汲汲于功名,可尚也哉。尝见唐建中中,朱

巨川有颜鲁公书诰,又有徐浩书诰,盖巨川好事,能请名笔,故流传至今,人争宝之。若其它,皆子孙收藏,以为世家文献。今子固此《诰》,书出名笔,而子固之高风,固其可想慕者也。爱其屋者及乌,而况《告身》哉。一展卷间,而子固之高尚,宛然在目。此固墨林之所以宝之者也。嘉靖戊午九月廿又三日,文彭谨跋。”钤印:文彭之印、文寿承氏。(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068册,第172页。又见《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077册,第102页。)

●仲冬十九日,为戚元佐作隶书《出师表》,款云:“戚希仲先生有志于古,出此乌丝楮命书分隶,所谓问道于盲者也。辞之不得,漫尔涂抹,幸有以教之。嘉靖戊午仲冬十九日记,雁门文彭。”(《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3册,第106页,上海博物馆藏品。)

戚元佐,字希仲,嘉兴人,嘉靖壬戌(1562)进士,官至尚宝司卿。任礼部主事时,曾因荐同里人项元深遭给事中辛自修弹劾,可见其与嘉兴项氏关系甚密。善书画,著有《青藜集》、《携李往哲列传》。

●仲冬二十日,为项元汴跋《陆放翁手简二通》:“放翁以诗名重天下,受知周益公、范文穆,为中兴大家。尝读其《剑南集》,爱不忍去手,思见其人而不可得。今得观此二帖,恍然如侍左右,何其幸哉。然放翁在当时不以书名,而遁丽若此,真所谓人品既高,下笔自然不同者也。二帖一与仲信议婚,一为明远题卿禅师遗墨,放翁到今不为久远,而此三人者皆不可知。昔蔡明远,鄱阳一卒尔,以鲁公之书而传,仲信既与翁结婚,而禅师遗墨有见晚之恨,则二公要皆非寻常流辈人矣。而余皆不之知,鄙浅可笑。此卷既归墨林,墨林博雅好古,而蓄书极富,必能考以补余之不迨也。嘉靖戊午仲冬二十日,后学文彭谨题。”(郁逢庆《续书画题跋记》卷三,四库全书本。)

●至日,为父文徵明代笔,补书苏东坡《赤壁赋》前缺三十六字,跋乃小楷,亦文彭代笔。

上海古籍书店本《苏东坡墨迹选》之《赤壁赋》:右东坡先生亲书《赤壁赋》,前缺三行,谨按苏沧浪补《自叙》之例,辄亦补之。夫沧浪之书不下素师,而有极愧糖秕之谦。徵明于东坡无能为役,而亦点污其前,愧罪又当何如哉?嘉靖戊午至日,后学文徵明题,时年八十又九。(转见《文徵明年谱》,第693页。)

文嘉《钤山堂书画记》:宋苏轼亲书《前赤壁赋》,纸白如雪,墨迹如新。惟前缺四行,余兄补之,余家本也。(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法书(宋)》,《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0册,第644页。)

●约在此年,为项元汴所藏朱德润《春山白云卷》作“春山白云”隶书引首。(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087册,第91页。)按:此卷后有周天球于己未仲春题跋,及王守于己未八月题跋,文彭此期与项元汴接触又密,故暂系于此年。

●约在此年,为谢时臣《练溪图卷》作七绝题跋,此图还有彭年、许初、文嘉等人题跋。(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二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087册,第213页。)

另:《文三桥与墨林十九札》,虽未言及书写时间,从第九、十、十七札云及见面时间及项氏所馈时鱼、白粲之物来看,二人应相距很近。第十札又云造宅拜访,故此时二人当在嘉兴。第十五札又云“家君近日书千文”,知文徵明尚健在。第七札云及“五月亦无不可”,而上年四月初,文彭尚在北京。故综合考察,将此十九札书写时间系于此年。(卞永誉《式古堂书画彙考》卷二十四,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8册,第62页。)信札内容如下:

1.《云麾将军》有二种,一是李思训,一是李昭道。《娑罗树碑》,舍弟有一本,今亦不知在否。区区旧有一本,是宋搨者,向已模糊至不可

识认,亦甚难得佳本也。适承时鱼之惠,饮次珍感,尚容面谢,不一一。彭顿首,墨林尊兄。

2.马远纸上者绝少。此幅若在绢上,当更见笔力。其人物似亦非张可观所能到。后“臣马远”三字写得甚好,若伪物不敢如此写也。且题识甚多,而皆名人可爱。惟杨仲弘诗不见,不知何故。楼观前一幅《西湖图》,后一幅《弄潮图》,虽无题识,亦是名笔。草草奉复,尚容面悉。彭顿首,墨林尊兄。

3.此汉时得天马,以铜范其形,制作精古,但无所用之耳。彭复,墨林尊兄。

4.《竹林对弈》妙甚,且王席帽、陶南村、钱曲江皆名人,可爱可爱。但吾兄不知弈旨,恐未深识其趣耳。一笑一笑。其元人卷,魏公笔亦精妙,伯温、太朴皆以四体,而吴孟思、赵期颐之篆,亦表表者。柯九思、康里子山皆可观,但李存及解搢绅欠佳耳。草草奉复,不能尽。彭顿首,墨林尊兄。

5.此吴中名画,旧传畜之必有灾祸,已毁于火,而南濠《寓意录》云已卖与他方人,虽家君亦不曾见,区区只见临本而已。彭复墨林尊兄。

6.二卷价虽高而皆名笔,补之梅花尤吴中所慕者,收之不为过也。所谓自适其乐,何待人言,一笑一笑。白粲之惠,珍感珍感,彭顿首,墨林尊兄。

7.四十之数亦非少初本意,缘本主不定耳。今以物往,可有成云之理,亦少初要成交故也。五月亦无不可,谨此奉复。彭顿首,墨林尊兄。

8.此原是黄茂夫者,前面画一枝枯树,其赋字如十二帖中最小者,其纸如雪,原价十六两,但不记后有何人跋耳。彭敬复。

9.《四体千文》佳甚,若分作四本,每本可值十两,其文赋因纸欠佳,故行笔涩滞耳。虽非佳品,然亦可刻者也,明后日诣宅赏阅也。草草奉复不次。彭顿首,墨林尊兄。

10.《千文》佳甚,惜乌丝欠妙耳。谨妙明日送表,或得造宅一面也。彭复。

11. 此范兰室所藏也,笔法高古,全学李北海,早间因吾兄无简见及,戏为漫语以复耳,一笑一笑,少间面尽。彭顿首,墨林尊兄。

12. 《文赋》旧所见者,不知尊意以为何如?少间欲赴马春江之招,当诣一面,不悉。彭敬复,墨林尊兄。

13. 中峰简是率然所书,此则用意耳。古人之笔,大概以简帖为胜者,以其不经意中耳。文敏书要如此卷长篇者亦少,不在题跋之有无也。大抵古人佳卷,不甚经意留在人家,所以只有题名者甚多。彭敬复。

14. 适有人持蔡君谟《茶录》在此,能枉驾过此一看否?彭顿首,墨林尊兄先生。

15. 杭人有回者,得题目千万见示。朝来头疮复炽,不能走谒。家君近日所书《千文》付来一看,不尽。彭白事,墨林尊兄。

16. 维摩问疾已领牒,区区所爱,未得如命,奈何。铜盆完璧,幸照亮,万万。彭顿首,墨林尊兄执事。

17. 适卖研许生持旧研十许并右军《思想帖》,后有松雪跋尾,在敝寓,屈过一赏,幸即命驾,和仲并望同来,拱候拱候!廿六日,彭顿首,墨林尊兄大雅。

18. 三卷皆佳品,但《袁静春墓志》当是顾谨中书,黄文献不能为也。彭敬复,墨林尊兄。其篆额类吾子行,不然吴孟思也。彭又白。

19. 此竹只元人耳,非文同笔也。其上题诗亦类梅道人,恐梅道人临与可,亦未可知也。草草奉复不次,彭顿首,墨林尊兄。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冯嫫锦车出塞图

□卜一克

昆仑堂美术馆藏佚名人物团扇(见封底),绢本设色,23.5×25.5cm。此图画一驼车,轩敞华丽,前后三进。最前坐一贵妇,妆饰华贵,二婢女左右服侍,其一怀抱琵琶,因此,此图往往被认为是“昭君出塞”。第二进从分开的帷帐间隐约可见一床,锦被绣褥,极尽豪华。第三进则不知其详。车前有五人环侍,其中一人躬身步行,手执缰绳;四人骑马,戎服虬须。最可注意的是画面右上一人,双手捧着一个锦囊,方方正正,其中当是印信,于是想到汉代另一奉使出塞的女性冯嫫。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汉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嫁岑陬。解忧公主有一侍者冯嫫,“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冯嫫为乌孙右大将妻。当时汉都护郑吉让冯夫人劝说乌就

屠,称汉兵方出,其势不可挡,不如降汉。乌就屠恐,但求封号。于是“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这就是著名的“冯嫫锦车出塞”故事,而“赐印绶”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细节。此图既画锦车,又持印信,当即此故事。

阮葵生《茶馀客话》“冯嫫和戎”条称:“罗龙书《锦车出塞图》,乃汉宫人冯夫人嫫乘锦车和西戎故事。杨升庵尝言此亦佳话,而六朝、唐、宋人无入篇咏者,惟刘孝威‘锦车劳远驾’,骆宾王‘锦车朝促候,刁斗夜传呼’一句一联而已。此事可画可歌,远胜明妃之失节,文姬之伤化也。”据杨慎所云,冯嫫锦车出塞故事历代鲜有题咏,则此图更其难得。

查士标与浙江书画关系考

□ 任军伟

美国洛杉矶市立美术馆藏有一套石涛(1642-1707)康熙三十三年(1694)八月为鸣六所作《山水》册八开,其中一开款识云:“此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而以名震一时,得不识哉?高古之如白秃、青溪、道山诸君辈,清逸之如梅壑、浙江二老,干瘦之如垢道人,淋漓奇古之如南昌八大山人,豪放之如梅瞿山、雪坪子,皆一代之解人也。”^[1]在这则题跋里,石涛视查士标(1615-1697)与浙江(1610-1664)为“一代之解人”,并将他们的画风同归于“清逸”一路。可见,查士标与浙江在艺术上有颇多相似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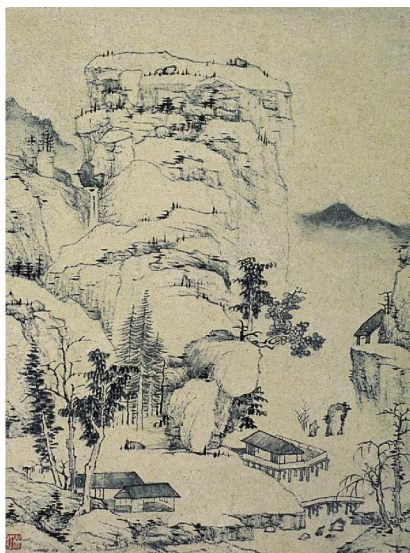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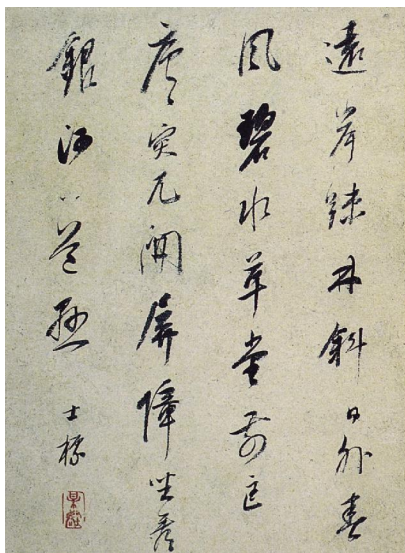
自从张庚(1685-1760)在《国朝画徵录》中把查士标“与同里孙逸、汪之瑞、释弘仁称四大家”以来,“新安四家”便成为“新安画派”一个相对固定的代表传播开来,并见于各种画史论述之中。“新安四家”中,查士标与孙逸(?-1658)、汪之瑞(生卒不详)、浙江皆有善谊,尤其与浙江交情甚笃,二人颇多艺文酬唱。

浙江俗姓江,名韬,字六奇,安徽歙县人。查士标曾在《题浙江上人画》诗里,提到他与浙江的天都之约。其诗有云:

廿年前负天都约,此日仍看画里山。

妙迹依然人不见,松间鹤梦几时还。^[2]

这首诗未署系年,今已无从考证题于浙江的哪幅作品之上。但由此诗,约略可知查士标与浙江的交往熟识应当较早。诗中所及天都,乃黄山的第一奇峰,故安徽休、歙二县之人,常自称天都人。查士标与浙江之“天都约”,实则是一起游览黄山。但依查士标诗句而言,这一约定



查士标 题浙江《山水》册之一 纸本 29.5×22cm 天津博物馆藏



查士标 题浙江《山水》轴
故宫博物院藏

却未能实现。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明清易代的战争所致。在顺治二年(1645)九月,清军攻占南京后不久,便趁势向徽州进攻。时徽人金声(1589-1645)^[3]和江天一(?-1645)奋起组织抗争,各地军民纷纷响应,他们不仅有效阻碍了清军的进攻,还收复了被清军占领的宁国、旌德、泾县和宣城等失地。但由于徽州御史黄澍降清,引清兵攻入,徽州遂破。徽州人于是纷纷南逃避难,浙江亦在其中,他偕老师汪无涯(生卒年不详)由水路经杭州,南抵福州^[4]。当浙江辗转至福建时,唐王朱聿键(1602-1646)的政权已被清军摧毁,在“居天游最胜处,不识盐味且一年”^[5]之后,浙江毅然于顺治四年丁亥(1647)皈依武夷名僧古航道舟(1585-1655)禅师门下,法名弘仁,字无智,号浙江,自此便不再用俗家姓名。由于社会的大动荡,查士标与浙江从此一别数十年再无从相见。查士标只能通过观赏浙江的画作,来寄托对浙江的思念之情。而在“天都约”之后的二十年里,浙江已多次登临黄山,并以黄山为题材创作了不少山水画,查士标却只能在梦中祈盼

着他与浙江的再次相聚。

从现存查士标对浙江绘画所作的题跋来看,不仅可以看出查士标对浙江绘画的独到解读和赞赏,而且还可以看出他受浙江绘画的影响。

如天津博物馆藏浙江所作《山水》册八开,每开皆有查士标的题诗,金瑗《十百斋书画录》卯集著录^[6]。从题诗内容看,多为写景抒情的表达,是查士标根据浙江山水画境所作的酬唱,这里不赘说。而故宫博物院藏浙江所作《黄山图》册,共计六十开,分装五册流传至今。每开一景,景景皆有来历,堪称一本真实版的黄山导游图。册后有萧云从、程邃及查士标等八人题跋。其中,查士标的题跋对我们了解浙江绘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跋有云:

渐公画入武夷而一变,归黄山而益奇。昔人以天地万物为师,况山水能移情于绘事有神合哉。尝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乃足称画师。今观渐公黄山诸作,岂不洵然?邗上旅人查士标题。^[7]

从这则题跋来看,查士标对浙江山水相当熟悉,但因浙江入武夷山前后的作品绝少见到,我们无从比对查士标这里所说浙江山水风格上的变化。对于查士标眼中的“归黄山而益奇”,今结合浙江存世作品,尚可作细致分析。

众所周知,浙江对倪瓒的山水是极为推崇的,他虽也兼学黄公望,但仍对倪瓒绘画用功最深。弘眉在《黄山志》中说浙江“凡古今名家悉究其法。晚岁尤爱云林笔意。”^[8]冯仙湜等人所撰《图绘宝鉴续纂》说浙江“初师宋人,及为僧,其画悉变为元人一派,于倪、黄两家,尤其擅长也。”^[9]周亮工在《读画录》中亦说浙江“喜仿云林,遂臻极境”^[10],浙江本人也一直视“迂翁笔墨予家宝,岁岁焚香供作师。”^[11]浙江虽然对倪瓒效法尤多,但从其作品来看,也并非亦步亦趋地求其形似,而是能“悉究其法”,加以创变。一方面,在师法倪瓒的同时,他还兼取宋人



查士标 题跋浙江《黄山图》册 纸本
21.2×18.3cm 故宫博物院藏

之法,故其作品中的线条多刚劲、直硬,而在用笔上则多为圆笔中锋,腕力千钧,力能扛鼎,无论是退笔还是渴笔,均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用墨亦与用笔相得益彰,虽然惜墨如金,却也能笔墨淋漓。概言之,浙江作品在风骨上多似宋人,而在神韵上则类于元人。另一方面,在师法造化上,他也与倪瓒多有不同。倪瓒师法造化,表现的是一河两岸式的太湖风光;而浙江师法造化,主要表现是雄奇巍峨的黄山风景,其画中几何形体似的山石造型,即来源于黄山的真实图景。他能以宋人之造型和倪瓒之笔意,把黄山的山石丘壑、林亭古渡和晓雾风帆等,很好地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两人的画作一比,这种不似便一目了然。再加上乱后归歛,浙江看到故乡山河变色,心中的悲愤之情无可抒发,只有通过手中的画笔,在寸缣尺素之上寄托情感,其画中的点点墨痕,实则蕴含着他的辛酸之泪。因此,他笔下的黄山,虽貌似荒寒,却也交织着他深厚的感情。正如查士标在上述题跋中所说:“况山水能移情于绘事,有神合哉。”石涛在题浙江《晓江风便图》时亦说:

公游黄山最久,故得黄山之真性情也。即一木一石,皆黄山本色,丰骨冷然生活。^[12]

这都是很有见地的评价。

另外,查士标还曾为友人汪度所藏浙江《白龙潭图》题诗:

我家黄山未识面,闻说龙潭为色变。
倒挂苍崖百尺寒,界破青山一匹练。
潭水澄涵清照人,潭中怪石白粼粼。
桃花涧雨飞丹井,采药溪边春复春。
紫霞仙人常曳杖,探奇岩巅或潭上。
夷犹坐啸不知还,溅沫奔流劳意象。
时有巨然画手奇,钵内狞龙势莫羁。

披图错愕三叹息,安得骊珠迸入诗。^[13]

白龙潭也是黄山一景。虽说出生地休宁离黄山不远,但查士标却从未上过黄山,如其所说“我家黄山未识面”。在诗中,查士标不无羡慕之情,对浙江所作白龙潭山水细加描绘,大力赞赏。正因为浙江常游黄山,耳濡目染,其精神统摄皆为黄山,黄山之本性已经融入到他的性情之中,故他笔下的一石一木皆是黄山本色,其丰骨冷然的画面,其实就是黄山之质。如其诗所云:

坐破苔衣第几重,梦中三十六芙蓉。

倾来墨瀋堪持赠,恍惚难名是某峰。^[14]

这首诗,很好地反映了浙江的画学思想。他这里所谓“坐破苔衣第几重”是说客观准确地观察实景,“梦中三十六芙蓉”是说一旦被自然实景吸引了,便会在心目间朝思暮想,甚至梦中仍在回味,这即指图像形式的构思过程;“倾来墨瀋堪持赠”是说这种图式酝酿成熟之后,便以相应的笔墨语言,表现出自己心中的画意生机;而“恍惚难名是某峰”则是说这个创作过程并非是简单的对景写生,而是经过了画家意象的转化。因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既有自然的客观之美,又呈现出超越物象的“恍惚”境界。浙江还说:

董北苑以江南真山水为稿本,黄子久隐虞山而写虞山,郭河阳至取真云惊涌以作山势,固知大块自有真本在。〔15〕

在这段论述中,渐江指出了董源、郭熙和黄公望的绘画创作离不开自然,而自然山水才是绘画创作的“真本”所在。正因为渐江师法黄山而能得之心源,才形成了自己山水的面貌特征,最终没有落入倪、黄绘画的藩篱。渐江自己也尝说:

敢言天地是吾师,万壑千岩独杖藜。

梦想富春居士好,并无一段入藩篱。〔16〕

应该说,查士标对渐江的这种见解是十分认同的,其时,在查士标眼中的渐江绘画,还远不止于山水,其他诸如墨梅、墨竹、树石,甚至人物等,查士标也多有评论。

渐江一生爱梅,在其卒后,友人还在他的墓前种植梅株数丛,故他又被称为“梅花古衲”。渐江爱梅也善画梅,颇能得寒梅之疏枝淡蕊、冷艳幽香的风致。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幅渐江所作《梅竹双清图》轴(如图)〔17〕,诗堂有查士标题跋:

墨梅自逃禅老人后数百年,唯渐和尚独续一灯,虽王元章犹逊其逸。此图如借画梅说法,横见侧出,无不吻合,解此可与语禅。

画中墨梅从左边的石丛长起,双株相互交织,枝稀叶枯,上有梅花数朵。竹丛以淡墨表现,施以淡彩,绘于石后,若隐若现。画中用笔颇为瘦硬,结合干笔的恰当调和,梅枝被表现得苍劲有力,与轻柔疏落的梅花形成对比,给人一种孤冷清高的感受。查士标这里所说“逃禅老人”,即指南宋墨梅画家扬无咎(1097-1169),字补之,号逃禅老人,江西南昌人。因其所作梅花野趣横生,故被宋徽宗赵佶(1082-1136)视为“村梅”,对后世影响甚大。这里所说的王元章,即指元代墨梅画家王冕(1287-1359),字元章,浙江诸暨人。他所作梅花,一变宋人稀疏冷

逸之风,而变为繁花密蕊,给人以生意盎然、蓬勃向上之感。在查士标看来,他对“逸”或“逸品”的追求,一直是其绘画审美创造和风格方面崇尚的最高境地。从查士标的作品及他在这里品评渐江的作品来看,他认为作品要达到“逸”的境界,应具有“得之自然”的审美创造,这就要求画家不仅要广泛师法古人和造化,而

且还能跳出古人及造化的藩篱,最终达到一种自然之美,才能具有“逸”的品格。石涛认为查士标与渐江的画风同属于“清逸”一路,而查士标认为渐江的墨梅继承了扬无咎稀疏冷逸的绘画传统,与王冕繁花密蕊的墨梅相



渐江《梅竹双清图》轴 纸本设色
89.3×44.7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比,更有一种冷逸的风神。前文曾提及天津博物馆藏有一套浙江《山水》册八开,其中第一开虽绘巨石矗立,但浙江实际表现的是巨石前面的枯梅,因此,这幅作品被金瑗《十百斋书画录》命名为“梅坪”加以记录。查士标用白长庚的咏梅诗句“唯三更月其知己,此一瓣香专为春”、“以月照之偏自瘦,无人知处忽然香。”来对题浙江这幅梅坪,并认为“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中,可称古高手。唯渐公此幅足以当之。”^[18]可见,查士标对浙江的墨梅颇为认可,这也恰是他审美趣味的反映。

贵州省博物馆藏有一幅浙江所作《长松羽士图》轴(如图)^[19],是浙江少有的人物画作品。画中以白描手法表现人物,造型不甚娴熟,用笔也略为拘谨,但画家以岁寒三友之松、竹、梅来为人物作陪衬,却使画中人物显出肃穆和高洁的心性,超凡脱俗,伟峻秀逸。画上诗堂有查士标题跋:

浙江上人画名重一时,于丘壑竹树无不尽善,独人物不多见。此图作长松羽士,神韵悠闲,笔致皎洁,深得李伯时遗意。往曾为余作系舟图,一人危坐篷底,意度潇洒,正与此同。余野人也,固宜赠以野人面目。□□先生深于道者,乃无意而得此蓬瀛之客,岂天之所以赠金门曼倩、柱下老聃乎!辛未夏日,查士标题。

辛未为康熙三十年,即1691年,是年查士标77岁,时距浙江过世已有28年了。的确,浙江表现人物远不如其山水娴熟,故至今较少见到他的人物画作品。从查士标的跋语可知,浙江早年曾为他作有一幅《系舟图》,画中表现的人物与这幅《长松羽士图》颇为相似,皆能“神韵悠闲,笔致皎洁”。查士标在题跋中说自己是“野人”,确也道出了他闲云野鹤般的清散之性。浙江为其所作人物,当是



查士标 题浙江《长松羽士图》轴 纸本
114×56cm 贵州省博物馆藏

他本人的真实写照,如其所言“余野人也,固宜赠以野人面目”。查士标在跋语中提到的某某先生,应是请他题跋之人,姓名被人从作品中挖去,不知何故,今已无从考究,但能确知他是一位“深于道者”,查士标还言其“乃无意而得此蓬瀛之客,岂天之所以赠金门曼倩、柱下老聃乎!”蓬瀛之客是指蓬莱瀛洲的客人,蓬莱素有人间仙境之称,是个修道的好地方,既然是蓬瀛之客,看来此人道行不浅。金门曼倩指东方朔,柱下老聃指老子。查士标用此典故来评价此人,可见此人才略高迈,深不可测。浙江此画应是为其所作。在查士标看来,浙江人物画“深得李伯时遗意”。李伯时即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他是北宋后期影响最大的人物画家之一,其白描人物境界高超。浙江虽不以人物见长,然而图中的人物描绘,造型清古,笔法劲健,与查士标所言颇为相合。

这里不仅有查士标对浙江作品的题跋,而且浙江也多次赠画给查士标。如安徽博物院藏有一幅浙江所作《翠竹梧桐图》轴(如图)^[20],其款有云:

意作高桐幽篠,特纸促不称。二瞻以之覆瓶,甘所愿也;若为存贮,有玷秘笈。

孙逸有题诗云:“九龙山下王高士,师笔能分一段神。”诗中所指王高士即明初画家王绂(1362-1416),因曾隐居九龙山(今江苏无锡惠山),故有“九龙山人”之称。浙江画学王绂,然其画风比之王绂更显简洁清刚和冷峻静穆。浙江说他的画“有玷秘笈”,虽是自谦之语,但从一个侧面也暗示了查士标之富藏善鉴。同时,浙江此幅《翠竹梧桐图》轴,也影响了查士标《百尺梧桐图》卷的创作^[21]。这两幅作品,虽为一轴一卷,画风却相近,查士标不仅在画作的意境格调上效法浙江,而且在物象笔法的运用,也是浙江惯用的表现形式。由此证明,查士标曾受到浙江画风的影响。

再如浙江所作《画墨梅墨竹赠查二瞻》,也是浙江赠送查士标的一幅作品^[22]。这幅画作上还有浙江的三首题诗:

高凌空际胜芙蓉,倒卷丹梯覆草庐。
盘礴奇标吹欲堕,银花疑挂碧峰虚。

纷华敛尽伴耕耘,岩谷深藏冶媚薰。
擅得风光惊国色,素装何必艳钗裙。

数竿深处几枝存,相傍园林赋弟昆。
若使苍松来入座,并头三友傲霜根。

第二首诗中的“岩谷深藏冶媚薰”句,是说梅花冶容媚色,薰然可爱,但却深藏岩谷,长期与农人为伍。浙江在这三首诗中,以梅暗喻“梅壑”查士标,竹是他自己,松则是他们的共同好友汪之瑞,梅、竹、松在寒霜中傲立,就像他们“三友”在乱世中能保持应有的气节一样。浙江在诗中不仅标榜了他们三人的清风亮节,而且也说明了他们三人之间的良好友谊。

由此可知,查士标与浙江之间不仅有着较深的友谊,而且在艺术上还互相借鉴,他们不泥古、重写生的笔墨追求和清逸冷峻的艺术格调,在影响清初山水画坛的同时,还共同奠定了“新安画派”鼎盛时期的到来。虽然同为“新安四家”之一,但查士标与浙江山水画风有何异同呢?在笔者看来,上述石涛所谓查士标与浙江山水同属“清逸”一路,这种画风上的相似主要体现在师法倪瓒异同上。应该说,浙江是以宋人绘画的严谨法则把倪瓒山水给秩序化和规整化了。周亮工《读画录》里评说浙江画“喜仿云林,遂臻极境”,指的就是他的山水在笔墨坚括和形态规整上所达到的极高境地。然而,倪瓒山水中灵润和疏散的风致,在浙江山水中缺失难见,而倪瓒山水中的干笔和“枯寂”画风,反倒被浙江山水突显为一种主要的风貌特征。而查士标则不然,虽然二人都学自倪瓒,但在查士标的创作中,特别是后期阶段,查士

标在更多地把持倪瓒山水语言原汁原味的同时,进而又能用粗笔重墨,使其画面变得更加荒率与淹润了。如果说浙江山水追求的是一种健拔、精洁和严整的艺术精神和不食人间烟火的枯寂之境的话,那么查士标的山水却少了些许冷寂与枯淡,从而于平和之中显现出更多的清逸、圆润而秀美的笔墨神采。

(作者单位:中国书画杂志社)

注释:

[1]转引自朱良志《南画十六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77页。

[2]查士标《种书堂题画诗》下卷《题浙江上人画》。

[3]《金声传》云:“福王立于南京,超擢声左佥都御史,声坚不起。大清兵破南京,列郡望风迎降。声纠集士民保绩溪、黄山,分兵扼六岭。宁国丘祖德、徽州温璜、贵池吴应箕等多应之。乃遣使通表唐王,授声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诸道军。拔旌德、宁国诸县。九月下旬,徽故御史黄澍降于大清,王师间道袭破之。”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七七,中华书局,1974年。

[4]《康熙歙县志》,见汪世清、汪聪《浙江资料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页。

[5]浙江《与程蚀庵》,见汪世清、汪聪《浙江资料集》,第48页。

[6]浙江《山水》册,书画共十六帧,墨笔六开,浅绛二开,俱纸本,纵29.5厘米,横22厘米,天津博物馆藏。第一开画“梅坪”,查士标书法对题:“白长庚有咏梅句云:‘唯三更月其知己,此一瓣香专为春。’又云:‘以月照之偏自瘦,无人知处忽然香。’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中,可称古高手。唯渐公此幅足以当之。梅壑老人士标书。”第二开画“秋山亭子”,查士标书法对题:“草木易零落,松竹只青青。石间留隙地,我欲着孤亭。士标书,浙江道人画。”第三开画“绝壁飞泉”,查士标书法对题:“闲云流绝壁,幽响落泉声。不觉添吟思,秋来一倍清。拟坡公书法,士标。”第四开画“墨山”,查士标书法对题:“雨重烟浓山更深,半山楼阁昼阴阴。道书一卷香凝榻,岩翠千层鸟堕林。士标。”第五开画“溪边钓艇”,查士标书法对题:“奇峰留半面,老木不繁枝。闲来无个事,一艇泊溪湄。士标。”第六开画“远浦风帆”,查士标书法对题:“东行十日又西游,潮老钱塘雨未收。两岸青山无断绝,白云堆里出孤舟。士标。”第七开画“春山草堂”,查士标书法对题:“远岸疏林斜日外,春风碧水草堂前。匡庐突兀开屏障,坐看银河一道

悬。士标。”第八开画“松石”,查士标书法对题:“溪行望武夷,削壁何斩截?赤霞乱不收,大化元气泄。下有万年松,上有太古雪。祇恐月明中,铁笛吹石裂。祇先道兄偶得渐公八帧,属标书其左。”《明清安徽画家作品选》第30-33页影印;《中国书画全书》第7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第655页。

[7]浙江《黄山图》册,纸本,有水墨,有设色,纵21.2厘米,横18.3厘米,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安徽画家作品选》影印,第44-56页。

[8]汪世清、汪聪《浙江资料集》,第181页。

[9]汪世清、汪聪《浙江资料集》,第182页。

[10]周亮工《读画录》,见《周亮工全集》,第5册,凤凰出版社,2008年。

[11]浙江《偈外诗》,见汪世清、汪聪《浙江资料集》,第39页。

[12]浙江《晓江风便图》,纸本设色,纵28厘米,横243厘米,安徽博物院藏。《明清安徽画家作品选》影印,第20页。

[13]闵麟嗣《黄山志》卷七,见汪世清、汪聪《浙江资料集》,第88-89页。

[14]浙江《画偈》,汪世清、汪聪《浙江资料集》,第38页。

[15]王泰徵《浙江和尚传》,见汪世清、汪聪《浙江资料集》,第3页。

[16]浙江《画偈》,见汪世清、汪聪《浙江资料集》,第36页。

[17]浙江《梅竹双清图》轴,纸本设色,纵89.3厘米,横44.7厘米,浙江省博物馆藏。《明清安徽画家作品选》影印,第6页。

[18]金瑗《十百斋书画录》卯集,《中国书画全书》第7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第655页。

[19]浙江《长松羽士图》轴,纸本墨笔,纵114厘米,横56厘米,贵州省博物馆藏。《明清安徽画家作品选》影印,第6页。

[20]浙江《翠竹梧桐图》轴,纸本墨笔,纵57厘米,横32.5厘米,安徽博物院藏。《明清安徽画家作品选》影印,第27页。

[21]查士标《百尺梧桐图》卷,纸本墨笔,纵30.5厘米,横145厘米,上海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4册沪1-2522影印,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62页。

[22]汪子涛《所见书画题跋》,见汪世清、汪聪编《浙江资料集》,第44页。

艺坛三绝谈月色

□ 李海珉

谈月色(1891-1976),广东顺德人,原名溶,字古溶、溶溶,排行第十,人称谈十娘,晚年号珠江老人,室名梨花院落、旧时月色楼、汉玉鸳鸯池馆等。4岁时被送尼庵寄养,15岁出家,31岁回俗,嫁于蔡守(哲夫),改名月色,参加南社,入社号1085,以画梅、篆刻、瘦金书著称。

谈月色,生于亥时,父母因为多子且迷信,认为“亥时”与“害死”谐音,有克死父母之嫌。于是四岁那年被送到广州清泉街檀度庵寄养,八岁入私塾读书、写字、学习绘画且诵读佛经,古溶富有先天秉赋,进步很快,15岁削发为尼,法号悟定。古溶聪慧,读经识字接受能力极强,书写经文,娴熟而有灵气,豆蔻年华,即以善诵经、娴书画为人称道,所书经文传出,娟秀清丽,惊动了一班文人。1917年初,赵藩(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李根源(广东督办)和蔡哲夫(军政府秘书长、财政顾问)等聚会于檀度庵,正好谈古溶值日知客。三人发觉此姑能书善画,谈吐不凡,非常惊讶。从此赵藩等人成为檀度庵的座上客,经常邀请古溶一起吟诗作画,谈论艺事。其中那位岭南名士蔡哲夫,更是深为古溶才情倾倒,时不时只身前来与古溶研讨文艺,古溶也仰慕哲夫,不久即产生了感情。不过,这段爱情犹如马拉松,拍拖了五年之久,并非如有些文字描写的那样,多情女尼为了爱情

而奋勇地冲破樊篱终成眷属。哲夫是有家室的,他的夫人张洛同为南社社员。蔡哲夫为自己取字成城,源自《诗经》“哲夫成城”之句,《诗经》还有“哲妇倾城”一语,蔡哲夫即为夫人取字“倾城”,以同自己所取之字相谐。婚后,夫妇俩不仅诗词唱和,而且不时合作书画,尽管外间说张倾城有貌而乏才,哲夫为了造就一位诗书画三绝才女,大半由他捉刀。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夫妻俩的感情还是融洽的。再说,哲夫要娶古溶,那么只能作如夫人,也就是作妾,只是太委屈了这位才女。当时南社中人反对哲夫娶古溶者不在少数,包括他的好友黄宾虹。最终促成这一婚事的应当说借助了一股外力。当时,广州市政府风声传出,将取缔几座尼姑庵,檀度庵就在其中。尽管仅仅是一个动议,不过作为一种外力,一个借口,已经足够了。试想谈古溶现在面临困境,那么哲夫当然要挺身而出保护她了,而最好的保护就是娶她回家。这一年,民国十一年,古溶已经31岁,哲夫42岁,由高天梅和程大璋二位作媒,正式成婚。当时哲夫以玉鸳鸯盛诸珊瑚盒中作为文定,取晏殊“梨花院落溶溶月”诗句,为古溶改名月色,以与原字溶溶相配。

婚后,月色在哲夫指导下研习篆刻,兼研画梅和瘦金书,由于得到程大璋、李铁夫、陈达

夫、黄宾虹、王福庵等人的悉心指导,年近不惑的月色在篆刻艺术开始崭露头角,因是女子,又因南社社友广为推荐,求印及请画者遍及全国,声誉日隆。

1928年,画坛巨擘黄宾虹途经广州,指导月色画技与篆刻,传授用笔用墨之法。月色请冯康侯刻了《宾虹衣钵》一印,以感谢师恩。她自己也用简笔大篆镌刻了《黄宾虹》一印,边款:“宾虹老师诲正,门生月色”,深表对黄师的敬仰。接着,又参学易大厂、李尹桑、邓尔雅等岭表黟山派之长,融会而贯通。她的仿汉印之作,功力最深,朱文劲挺遒润,白文停匀整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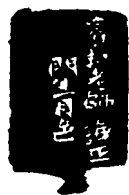
那一年,正好易忠篆集拓王福庵印作百方,加上品评跋语寄赠蔡氏夫妇,月色得以朝夕观摹,深深领略。1930年,蔡哲夫应蔡元培邀请,携月色同赴南京筹建中央博物院,当时王福庵正在金陵,月色得王师亲炙。不久,蔡哲夫在中央博物院任书画鉴定研究员、国史馆编修,与黄宾虹共事,此时的月色更时时得到宾虹老师的教益。所刻古玺、汉印、佛像印、圆朱文,又常以《天发神谶碑》意入印,规模粲然,技艺大进。朱文《啸湖》,线条干练,结构严谨;白文《仪汉斋》,用切玉法,工整爽利,两者都能深入汉家堂奥。《蔡守印信》属于

拟汉封泥之作;《甲戌九月廿七日喆夫月色访得百花冢孟阳题字》大有其师王福庵新浙派风格;《南京图书馆藏》,细朱文圆转多姿,大有吴让之、赵之谦法度。她也曾向寿石工讨教,以隶书作《蝶芜斋》一印,飘逸而雅有风致。

月色最让人称道的是以瘦金书入印,实开风气之先。南社社友沈禹钟《印人杂咏》赞叹说:“韵事红闺似仲姬,侨踪老向白门羁。瘦金字认谈家印,比玉分书未足奇。”她为南社社友姚光所刻的《重华嫡裔》边款说“石子社督世居金山卫,丁丑之役首当其冲,兵燹失去斯印,今另改造瘦金书钜印二方。时年甲申春仲,蔡谈月色。”此印铁画银钩,深得徽宗御书之三昧。《书禅》一印,有笔有墨,风神洒落。较晚镌刻的《力争上游》,收敛锋铄,归于温驯。

谈月色刻印声名鹊起,南社社友请求印作不乏其人,更有辛亥革命元勋,国民党元老,高级将领,文艺界名流,接踵而来。政界名人主要有孙科、李宗仁、李烈钧、冯玉祥、居正、邵力子、程潜、陈铭枢、李济深、陈布雷等;书法、学识名人张继、蔡元培、叶楚傖、马相伯、柳亚子、柳诒徵、陈陶遗、高燮等;还有文学名家姚光、吴梅、刘三、汪东、陈方恪等,他们所用之印,多有出自

谈月色篆刻



黄宾虹(附边款)



啸湖



仪汉斋



蔡守印信



甲戌九月廿七日
喆夫月色访得百花冢孟阳题字



南京图书馆藏

谈月色篆刻



蝶荒斋



重华嫡裔



力争上游



叶楚伦印

谈氏之手。

民国印坛，女子治印，有如此造诣者，月色首屈一指。不过也有人不信，认为是蔡哲夫幕后捉刀。其实

蔡氏早在1928年就因目力不济而封刀，闻言后感慨万分，作有一诗：“衰翁六十眼昏昏，治印先愁臂不仁。老去千秋有钿阁，床头反诬捉刀人。”1936年秋，蔡、谈二人一起在南京举办夫妇书画篆刻展览，观者如潮，盛况空前。几乎众口一辞，蔡氏于篆刻识见颇高，有他的《印林闲话》为代表，若说奏刀刻石，那么哲夫仅能望月色项背而已。

这里有谈月色为叶楚伦所治《叶楚伦印》一印，边款：“姜君可生属刻贻楚伦社督正篆，丙子夏谈月色仿汉朱文姓名印。年来外子罢官，牛衣清苦，画梅乞米，樵印为炊，备极艰辛也。月前叶公奉使南来，外子未数趋诣。日前李仙根过牟轩谈诗，并谓叶公殷勤问讯，念旧可感。唯希鼎力绍介，羿润豪利，市得以糊口，获赐多矣。月色又记。”丙子是1936年，蔡哲夫赋闲在家，谈月色画梅乞米，鬻篆刻和书法赖以糊口。月色与哲夫结婚后，一直过着清贫和颠



叶楚伦印边款

沛流离的生活，上述边款可证。再看她的一首题梅花诗：“易米梅花不讳贫，玉台壶史自千春。闽花绝品成遥寄，我亦城南穷巷人。”其中的艰辛不难想见。

谈月色先后任黄花考古学院研究员、广州博物馆发掘专员，过目古器文物众多。除得到蔡哲夫、黄宾虹、王福庵传授外，她与冯康侯、寿石工、徐星周、金息侯、周肇神、邓尔雅、陈达夫、唐醉石、简经纶、杨千里、李尹桑、沙孟海等素有交往，或得指教或得切磋。抗战胜利后，在总统府印铸局任职，与唐醉石、徐文镜、吴朴堂等名家共事，时时交流。再加家中金石书画收藏丰富，闲来摩挲古印、拓片，观赏名家印谱，见识深广，眼格独高，自然出手不凡。时称“现代第一女印人”，不为虚誉。

谈月色所画墨梅，格调高古，素有“梅王”之誉。月色画梅，师承广泛，不拘一格。她拜黄宾虹为师，艺事大进，长于描绘昙花、杜鹃、荷花、牡丹诸多花卉，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梅



谈月色 墨梅

花。她又转益多师，案头备有《汤雨生（贻汾）墨梅册》一部，闲来翻阅体味，一年之中就临摹了18遍，同时研究吴昌硕及诸多时贤，观摹技法，领会风格。由今及古，上承宋元遗风，下继明清笔意，特别属意于扬州八怪的技法与画风。不过她更多的是师法造化。每年花季，六榕寺赏梅是她必作之举，留连徘徊，朝观夕摹；她不辞

辛劳，连续多年登上广州的萝峰，甚至住宿在萝峰寺内，为的是踏遍30里梅海。此外，她不怕长途跋涉，一再奔赴苏州邓尉山与杭州超山，置身梅林雪海之中，俯仰歇息，领略陶醉。晚间，或面对瓶梅，凝神沉思；或随灯影旋转，对影写照。

月色与哲夫，可谓夫倡妇随的典型。夫妇俩不仅诗词唱和，更多的切磋艺术。篆刻、书法之外，最多的就是画梅。哲夫也喜欢并擅长画梅，二人真是天作之合，相得益彰。一次，哲夫外出，心灵感应，使他看到了月色夫人正在画室点染梅花，于是作了一首七绝：“画梅已遍九洲九，不言竟能飞上天。数点梅花作细事，留传并足九千年。”书写成一个条幅，立马航空邮寄给夫人。

上世纪30年代，月色居广州时，书画家方树梅（癯仙）专程来访，谈到云南晋宁蟠龙山有元梅，粗可合抱，花大如桃。月色一听，顿时兴奋异常，可惜当时花期已过。次年，月色夫人终于来到元梅树下，一睹风采。她将元梅的形态、线条、光色及周边环境，尽数装于脑海。急急赶回家中，当即泼墨挥洒，一丈见方的《蟠龙墨梅通景》终于诞生。老干新枝，樛曲万状，干裂苔藓，疏密相宜。画幅之中，一派淋漓的墨气，浑成而又高古；似有腾龙的雾气，豪迈而又坚贞，受到艺术界的激赏。自此，谈月色“梅王”之称，尽晓画坛。到1937年，在《蟠龙墨梅通景》题跋的知名人士有：蔡元培、于右任、章太炎（篆书“盘龙古香”）、冯玉祥（隶书“此是春风第一枝”）、李根源、张继、程潜、柳诒徵、汪东、张默君、张光、关赓麟、王灿时、柳亚子、金天翮、王謇、张祖铭、萧娴等50余人，堪称民国年间著名书家墨迹的集锦。

她的瘦金书，瘦直挺拔，横划收笔带钩，竖划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联笔则如游丝行空，运笔飘忽快捷，笔道瘦劲而不失其肉，转折处隐约可见运转与提顿。



谈月色 墨梅

术陈列馆举办“谈月色书画篆刻展览”，深受社会各界欢迎，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又当选为第三、四届全国妇女代表，江苏省政协委员。20世纪50年代，月色将她与夫婿搜集的广东文物捐献给了广州市文管会。70年代，又将保存完好的一箱名人字画，包括她自己的佳作精品及记载他们夫妇艺术生涯的著述手稿，捐献

1941年哲夫去世，月色在南京印铸局供职，多方搜罗夫婿诗文，汇集成《寒琼遗稿》，为了付印，鬻印之外，努力画梅，南社旧友及社会各界，纷纷出手购画，对此，月色专门作了《画梅乞米图》，抒发深深的感慨。

新中国成立后，谈月色三次假座江苏美

给了南京市文管会。

谈月色珍藏的书画信札，金石印玺，有生之年两次遭难。一次，在哲夫去世后不久，一天她去南京印铸局上班，家中被窃，偷去一大批书画，其中最为珍贵的苏曼殊画作22帧，名人题咏16件，英国诗人弗来遮题诗册页等。第二次更惨，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红卫兵大破四旧，挨家挨户搜寻所谓的封资修黑货，大量焚烧不算，藏家还要遭到非人的侮辱和斗争。蔡哲夫遗留下来的信札，多不胜数，为了避祸，月色痛心地用来煮饭煎茶达一月有馀，不计其数的珍贵文史资料付之祝融。

月色为了哲夫遗稿问世，可谓历尽艰难，不过，还是留下了遗憾。蔡氏在上世纪30年代，撰写过《印林闲话》，连载于《香港华字日报》，抗战爆发，原稿散佚。南社后期主任姚光访得《印林闲话》一个抄本，准备付印，他先寄给月色夫人，请她校勘。月色很高兴，不仅续补数条，还撰写了一个题跋：“先外子寒翁著《印林闲话》，刊入《香港华字日报》，屈计已十年矣。其后天涯浪迹，变乱频更，行篋飘零，稿多散佚，即作亦不知遗失何所。甲申春日，姚石子社督投书于余，附寄此册，云以重价购诸书肆，盖为同嗜者专录报端，哀然成册，复流落于书贾。石公笃念交谊，特以此册印单行本，恐所录讹误，属为校正。而不知元稿因渺不可得，只以昔所闻于寒翁粗可记忆者稍加勘订，并附翁续论数篇，还诸石公。昔人云一生一死交情乃见。余不仅得喜读寒翁佚作而深致感石公之尚义，泚笔志其梗概云。民国三十三岁次甲申暮春，蔡谈月色识于白下茶丘西屋。”可惜的是姚石子于次年病逝，此书没有问世，月色引为憾事。1976年月色离世。四年后，《岭南书艺》据另一副本刊出了《印林闲话》部分内容，可惜不是全豹。

谈月色主要著作有《月色诗集》、《中国梅花发展史》、《月色印谱》等。

（作者单位：柳亚子纪念馆）

易均室与成都：楚云天隔锦里留

——民国金石学者潜江易均室先生寻踪

□ 王可万

以籍贯言，易均室先生不算成都人，但从1945年抵蓉到1969年弃世，前后在成都整整生活了24年，甚至比在故乡湖北潜江居留的时间还要长，从这个意义上讲，目之为成都人亦是理所当然，尽管老先生在署款中从来都是写“潜江易忠篆”。

易均室先生是民国时期一位学养十分全面的学者，无论是在传统的诗、词、曲、书画方面，还是专门的金石、篆刻、古文字、古籍版本、文物鉴藏等领域，都有非常精深的造诣，是当时颇负声望的学问大家，相与交游者皆并世耆宿俊彦，如黄宾虹、林山腴、章士钊、马衡、马一浮、谢无量、乔大壮、沙孟海等；其近400方自用印鉴，镌者不仅包括西泠印社创社元老吴石潜、丁辅之、王福庵、唐醉石，还有赵叔孺、方介堪、李尹桑、沙孟海、易大庵、蒋维崧、徐星洲、周菊吾、邓尔雅、黄少牧等三十多位大家，这样的规模和层次，在印学史上恐怕无人能出其右。均室先生入川后，对蜀中印学的发展也起过非常关键的作用，其衣钵弟子徐无闻在《纪念篆刻家易均室》一文中言：“民国以后的四川人，一般都只晓得吴昌硕、齐白石。抗战以后，易先生来四川，许多人才大开眼界欣赏到现代许多名家典雅清新的作品。四川的篆刻家如沈

涓庵、周菊吾、余秩凡等，更在与易先生的直接交往中，获得教益。”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位本该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学者，因为种种原因，至今仍鲜为人知，实在令人唏嘘扼腕。

一、易均室其人：世间不可无

易均室，名忠篆，字均室、灵均、篆伯、仙侣，号稻园、病因生、绾秋词人、沧浪散人等，斋号有静偶轩、十清宦、柏风草堂、沧浪一舸等，清光绪十二年（1886）出生于湖北潜江一个殷实的耕读之家，1969年3月1日卒于成都玉泉街69号家中，享年84岁。

先生幼聪慧，以县学附生考入武昌经心书院，1905年官费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毕业于政治、文学两科，1911年回国。留日期间，经同乡李书城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时，以国民党县分部部长身份在潜江率众响应，被举为县议会议长。此后，历任湖北靖国军参议、护国军湘西防务督办公署顾问、湖北省议会议员、陆军第六十七军秘书长等职。讨袁事息后，因不堪政界贪弊污浊，毅然决然不问政治中事，转向考古艺术与古籍文献的研究，曾避居乡间达十年之久。

1928年初，应湖北省主席张知本之请，出任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1929年因教育厅长易

人,交谢馆职。随后创办“艺甄社”及《艺甄》月刊,并先后任教于湖北省立第一女中、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今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前身)、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今湖北美术学院前身)。抗战爆发后,漂徙川陕,历任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国立四川大学、私立成华大学、私立西南学院等校教授,1952年被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系首批馆员之一。

易均室先生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学者,治学严谨精深,博学宏通,仅目前所见,其著述文章就达六十多种(篇)。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之一的王福庵,在为其所治印边款中曾言:“均室道盟人品诗词似南宋白石道人”、“精研三代文字”;沙孟海《沙邨印话》总共一百一十四条,道及均室先生就有十三条二十六处之多,在论其搜罗印石、刊布流传之功时,大赞“世间不可无易均室”,更言“(易均室先生)于历代金石之稔熟,当世几无出其右”,可见其在友人心中的位置和分量。

二、成都:本是迂道终淹留

均室先生第一次到成都其实是在1941年,当时是应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黎锦熙教授之邀前往该校任教,路过而已,没有作太多的停留。在国立西北大学时,均室先生兼任文学、历史两系的课程。城固远离战场,本来尚属安定,可是后来校长易人,控制日严,以“是否国民党员”为唯一衡量标准,无端解聘了一大批教授,均室先生亦在其中。当时的校方肯定不知道,均室先生其实是同盟会的元老、辛亥革命的元勋,讨袁期间还曾因身隶国民党籍被通缉过,只是后来不堪政界贪弊污浊,缴还党证、自请出党罢了。横遭解聘时,已经是1945年,适逢抗战结束,均室先生打算返回家乡湖北,先迂道到了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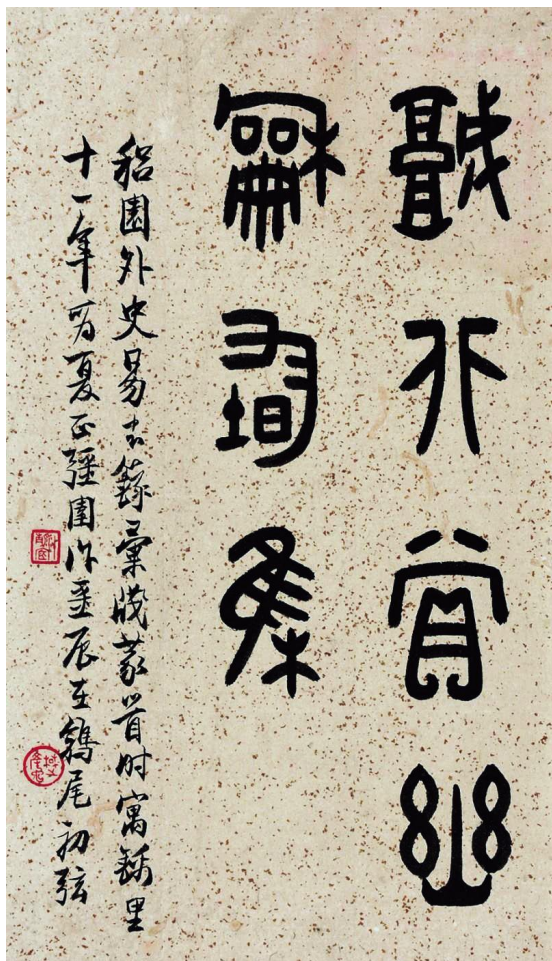
从陕西城固到湖北,转道成都并不是捷径,揆诸当时情境,原因恐怕有三:一是湖北的

家产居所于入川前皆已变卖,匆促回鄂,落脚之地难觅;二是均室先生幼子此时不到三岁,又系暑中,恐不耐长途跋涉;三是鄂中工作暂未落实,成都有亲友朋辈,或可徐图计之。从《隔云集》中林山腴“只愁千里江陵去,一曲余声不可寻”的题辞也可看出,均室先生是做好了回乡的打算和安排的,并为此婉拒了四川大学的教授聘约,而转应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的聘请。不巧的是,国立湖北师范学院这时因迁校风波闹起了学潮,持续达三月之久,无法开展正常的教学工作,未能赴任,加上林山腴等蜀中好友的挽留,遂第二次应下了四川大学的聘约,在成都真正安顿下来。

华阳人舒漱芝在城固时从均室先生学词,听说均室先生留川,非常高兴,写信说:“欣悉吾川有福,仍留暂住。川人受楚师之惠,至今尚传法乳,兄当继湘绮楼矣。”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均室先生到成都后,先是住在宁夏街同德里五号(今北校场西路成都军区大院附近),与两位连襟合住,一家三口栖身在堂屋隔出的一个小房间里,后来搬到玉泉街六十九号(今为成都军区司令部经济适用房玉泉院),一直到终老。其中1964年,为收留难中的丁季和先生,又让出一间房,无偿供其居住。玉泉街69号是贵州安顺罗蔗园先生家的房产,院中除罗家外,还住有罗家的亲家黄家,总共约有七八户,文革中,易、黄两家书籍古物皆遭焚掠。

三、川大:忽然聘消生计愁

均室先生在四川大学,开始时的身份是兼任教授,在中国文学系担任古文字学、词选、曲选、小说选四门必修课的讲授任务,同时还在历史系开中国美术史选修课,按授课时间计薪。一直到1948年8月才转为专任教授,“每周照教育部颁定标准时数授课”,月薪伍佰圆。可惜好景不长,1949年1月10日,均室先生在雇车赶往校中授课的路上,被某军阀司令部的座车冲撞,昏厥一小时方才抢救过来,左侧锁



易均室 题《城北赏幽和韵集》

骨、肋骨骨折，眼、耳、面部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上课途中发生车祸，照现今通俗的说法，显然应该算是“工伤”，但据均室先生自传中所言“此等性命危险的牺牲，恰是在赴课时间，又是因校内宿舍分配不匀，本人不得住校所致……念本人此等遭害危及性命，纯粹是为教学而来，应受校中抚恤与优待”来看，当时校方可能并没有尽到相关的善后责任。不仅如此，成都解放后的次年，四川大学改组，甚至将均室先生列在了“未续聘”之中。

1950年1月，华西协和大学曾天宇教授在致均室先生的信中还特意提到：“偶阅日记，方记去年此时正吾兄受伤在院时也。前时其部下肇祸之向君，今日已为阶下之俘……”可见还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并不是一场小车祸。均

室先生未能续聘，不知道是不是与此事有关。不过几乎是同时，成华大学也未续聘，由此观之，很可能是早年的国民党身份或者年龄偏大（均室先生此时已65岁）所致，当时都是军代表接管高校。

出四川大学后，均室先生生活无着，靠典卖旧藏度日。后经成都建设局局长沈诚介绍，往私立西南学院中文系授课，但月薪十分有限，仍不能维持最低生活。到1951年3月，成都镇压反革命，连学校也被查封了，遂随军事管制委员会参加教职员工的集体学习，毕后虽被派在“分发工作之列”，但一直没有确信。之前的1950年3月，虽曾因川西文物委员会之荐，两次参加过文教厅组织的文物评价会议及提选文物展览出品会，但因须参加军管会的集体学习，未能任事到最后。这一时期，家乡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也曾多次来函相邀，但都因路费无着而止。这种状态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仅食四号面粉”、“不得油盐者七八日”，甚至写信一多，“便觉邮费不够了”。

四、交游：析疑赏奇三五辈

均室先生居成都二十余年，交游广泛，过从较密者有林山腴、路朝銮、马一浮、曾默躬、谢无量、曾天宇、施孝长、曾祐生、沈涓庵、姚石倩等，年辈稍晚的还有罗蔗园、王白与、徐益生、隆莲、周菊吾、余轶凡、刘秉谦等，总计三十多位，不是硕学，就是俊彦，酬唱往还、切磋琢磨，足见一时之盛。

王白与（1902—1949），原名本霖，四川蓬安人，曾任《新蜀报》总编辑、总经理，与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章士钊等皆有唱和往来，1949年“11·27”大屠杀时英勇就义，系民革川康五魂之一。均室先生住宁夏街时，王白与住西城角巷（今四川省妇联附近），相距既近，过从尤密。王白与《食力斋诗词》中有《潜江易均室先生常过余西城角寓舍论诗说画，赋赠》一首：

“一角西城坐啸空,得君谈笑起欢惊。交情不独缘诗厚,嗜好何须与俗同。赏析目莹三代上,研摩心注六书中。龙阳才子风流杳,更向骚坛识楚雄。”可窥当时情境。1946年,均室先生准备印行《稻园论画绝句诗三十二首》,王白与先生为表祝贺,也题辞两首,其中有“华亭董子潜江易”句,认为是书可与明代董其昌的《画旨》相媲美。1947年夏,均室先生得观王白与先生所藏胡薇元与赵香宋通信册页(实为明信片),为题篆书引首“玉雪词翰合璧”并跋,跋毕仍不尽意,又依册页中胡薇元原韵填了“解连环”词一阙。此册页2011年3月已由重庆出版社以《玉雪双清——赵熙胡薇元的翰墨因缘》为名出版。

定居成都后的第二年,均室先生在西玉龙街的旧书店中偶然碰到了日后得享大名的徐无闻先生,并允纳为弟子,而其时徐先生还只是一位15岁的少年。更让人艳羡的是,徐先生17岁时,均室先生即命其为《稻园论画绝句诗》作跋;18岁时,又命其为“沧浪一舸”印补刻百馀字长款,得与路朝銮、谢无量、唐醉石、姚石倩等大名家同列并处,这对一位年未及冠的少年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和提携。徐先生的弟子向黄老师后来也感慨说:“一个少年能够遇上这样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真是他的福气!”此后二十馀年,徐先生追随均室先生杖履,亲聆警发,尽得所学,正如重庆晨报评论所说:“易氏藏印、藏书、藏金石较徐府更为丰富,对其(徐无闻)迅速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徐先生父亲鸿冥翁虽小均室先生十八岁,但其子既经均室先生纳为弟子,二人大可平辈论交,但鸿冥翁在致均室先生的书信中每每都是署“后学徐寿谨上”、“后学徐寿上”,甘与自己的儿子一样执弟子礼,这一方面固然是鸿冥翁的谦抑,但另一方面恐怕也真是出于心底的敬重与诚服。

1956年9月,谢无量因向仙乔之荐将往中

国人民大学任教,四川文史馆同仁在人民公园为其饯行,并“合影为纪”。均室先生长衫布履,五角竹扇,施施然、蔼蔼然,一如家中长者,令人直生亲近之感;夫人万灵蕤随侍在侧,襟袖微挽,不见钗环,虽是家常装束,却也端庄利落,毡墨赞襄之助犹可想见。均室先生题为“锦里角巾图”,“角巾”者,隐士之谓也,图中十人无论男女,皆着千层底布鞋,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同,但当时心境于此已可见一斑。

就目前所知,在成都与均室先生有过直接交往的,健在的还有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的苏园和叶进康两位馆员。苏老先生今年已是92岁高龄,当年在耕石馆中坐店刻字,均室先生常往其店中闲话,并教篆刻、传拓之法,现在还能见到许多苏老先生当年遵嘱补刻的边款、观款。苏老先生对均室先生篆“四川省图书馆收藏印”一事仍记忆犹新,事隔58年之后,凭记忆竟然还能摹出印稿。苏老长公子幼时曾见过均室先生,言“瘦瘦的,穿长衫,仙风道骨,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叶进康先生年辈要晚一些,与均室先生的交往主要在上世纪60年代左右,曾见1968年均室先生致叶先生一札,嘱其作画时于笔趣之外须再求墨趣,并指点充实笔力之法,推荐暇时多临黄庭坚《松风阁诗帖》。叶先生现在因身体原因,早已搁下画笔,当笔者辗转联系上时,叶先生非常高兴,屡言:“易老师和师母当年对我都非常好”、“关于易先生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我一定尽全力!”

五、轶事:荒摊踏遍老斫轮

蜀中“五老七贤”之一的林山腴在和均室先生《西江月》词中有“足茧荒摊千遍绕”句,说的是均室先生往古旧书店、杂货地摊中搜寻金石碑版、文献古籍事,“绕摊千遍”、“足生茧”,传神地写出了这一披沙拣金过程的不易。也正是这样,均室先生才凭藉自己的学识和眼力,让许多稀见的史料、文物得以免于湮没,其中不乏未经著录的孤本、孤品。试举三例:

印学史上，论文人篆刻多主始于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文彭、何震，在此之前，则无史可考。但据徐无闻先生记述，均室先生曾于荒摊上收得明成化年间沈贞吉（号南斋，明代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伯父）所刻“悠然见南山”白文方印，是印行书边款：“成化岁在玄默摄提格之病月上浣”，也即成化十八年（1482）三月，将文人治印的历史往上推了近半个世纪，足可补印史之阙，也难怪鸿冥翁大呼“喜饫眼福”。类似的还有在旧书店烂纸堆中发现巴树穀对联署款残片，以实物验证程芝华所摹刻的《古蜗篆居印述》的“乱真”程度。徐先生后来感叹说：“巴树穀那几个字写得很一般，在著录很广泛的书画传记中都查不出来，如果不是易先生这位非常独特的篆刻学家，谁能认识到这些烂纸片的价值呢？”

现藏于四川博物院的《九域守令图碑》，其发现也与均室先生有关。原四川大学历史系邓之琴教授早年在成都碑帖店中得一幅石刻地图拓本，图中有长江、大河、山东半岛等，因遭鼠啮，上下边缘及折缝中多处州县名称阙如。邓先生虽据四京名称断为宋代地图，并疑原碑也在四川境内，但一直苦无确证，困扰多年。后来知同校的中文系教授易均室先生收有该图拓片的下半幅（现藏四川大学图书馆），往观，借助下半幅上清晰的地名及残存的“京府四”、“绍圣间”、“管勾”、“兼管”等跋文，钩稽索隐，才进一步确认为北宋石刻地图，并最终考证出原碑在荣县文庙正殿后。《九域守令图碑》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年代最早的、比较精确的、以县为基层单位的全国性行政区划地图，比《华夷图》、《禹迹图》要早16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整个四川博物院也只有五件藏品能膺此称号。

川剧是我国戏曲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现在所能见到的川剧剧本大多集中在清乾隆年间，最早的是明代署名杨慎的《太和记》，但这中间有二百多年的空档，未见有川剧剧本传

世，均室先生上世纪40年代“于锦里书坊无意中购得”的《破梦鹃》或可补此之缺。《破梦鹃》全名为《四更破梦鹃》，计破黑鹃、破白鹃、破青鹃、破赤鹃四更（折），共28出，以“梦”贯穿其中，另有楔子《春婆说梦》和大结局《西山樵梦》。作者李雯，字章伯，约明崇祯初年人，书后有其自序及徐芳（1617—1670，字仲光，号拙庵）崇祯十五年（1642）之序。康熙五十年（1711），李雯后人李青“因科场事近，日夜搜寻书架”，方才得见。原四川大学教授、戏曲史论家任二北先生1951年在跋中指出：“此本体裁似在传奇与杂剧之间，颇得自由创作之趣。……可以入剧曲选本，方之名篇，诚无多愧。考川中剧曲作家寥寥可数，升庵太和以后几成绝响，乃觉此篇为可宝矣。”全书百又十页，每页七至九行，不分栏，满行三十字，小楷手书，朱笔点读，清代《杂剧新编》、王国维《曲录》、董康《曲海总目提要》皆未见有载，很可能是未刊的缮写底本、孤本，较清以后的流行刊本更显珍贵。

除上举三例外，其他还有宋朱熹琴、元韩林儿“管军万户府”官印、清屠倬“眠琴绿荫”印、陈师曾画张樾丞刻“明月松风”铜墨盒等等，都是极具文献研究价值的珍贵文物，恕不一一详述。

易均室先生一生不慕荣利，狷介自守，视文物典籍为性命，除捐献给湖北省图书馆40箱古籍、湖北省博物馆大量文物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还藏有其捐献的甲骨130片，近年拍卖市场亦屡有相关故物现身；其藏品广涉陶、璧、墨、砚、泉、书法、绘画、古籍、古琴、名印、石刻、竹刻、铜刻、瓷器、玉器、青铜等近二十个门类，而且每个门类都考析甚精，绝非泛泛，简直是一座艺术宝库！可喜的是，近年已渐渐有人开始留意关注，再过两年就是均室先生诞辰130周年了，希望还老先生真实面貌的日子不要太远。

（作者为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

黄子澄墓碑发现记

□ 郭志昌

明建文年间的太常寺卿黄子澄遇难二十三年之后,由他的儿子精心保存的骸骨,经过多方的辗转周折,才被安葬于风景秀丽的马鞍山下。他是在封建社会里继商鞅和李斯等之后死得最为惨烈和悲壮的一个官场中的人物,自己被砍去四肢血流如注疼痛至死不说,还牵扯了家族内亲外戚的 445 人为他陪死或遭受流放。两个儿子隐名埋姓、四处藏匿,并经多人保护才得以死里逃生。

在昆山当地官府和华藏寺僧的大力帮助下,明洪熙元年(1425)七月,黄子澄的遗骨被安葬在马鞍山阳翠微阁下方的山脚下(今春风亭西墙外、祖冲之雕像东的中间地带),御史刘琏为他写了墓志铭,墓前立了碑。黄子澄两个幸存的儿子死后也被安葬在父亲的墓旁。刘琏去世后,先被埋葬在遥远的通州,后来叶盛奏称其在边有功,乞恩褒恤,遂被诏赐御祭,迁葬于黄子澄墓旁。

清乾隆五十年(1785)冬十月,黄子澄坟墓得到整修。当时还有一个传说:因为年代久远,地面上已经没有墓的痕迹了,城隍庙的四宜轩有积土,道士想在上面筑一个亭子。台阶刚刚铺好,就被雷击毁了,而且是三铺三毁。道士疑惑不解,挖出地基,发现下面是黄子澄的墓。于

是报官,使墓得以修复。《顾丹五笔记》记载的进士钱溉亭的诗里,就有针对此事写下的“昔时诛戮无遗婴,此日风雷护残骨”的句子。当地士绅十多人捐款集资,截取知县赵遵律篆盖,知县裴元长撰文,候选知县孙铨书丹,在墓前立起了一块高约两米,宽 80 厘米,厚 21 厘米的青石墓碑。碑阳为“明太常寺卿分宜黄公子澄墓”等十二个大楷字,碑阴为碑文。

清光绪甲午(1894)署新阳县令万立钧重修黄子澄墓,在墓前竖起一块高 100 厘米、宽 50 厘米的花岗岩石碑,碑面阴刻“明黄节愍公子澄之墓”几个遒劲有力的楷体大字。

太平天国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和文化大革命,使黄子澄墓一次次遭到严重破坏,最终被夷为平地。乾隆年间的石碑至少被断成三截,其中两截被当作垫脚石铺在了路上,另一截不知去向。道光年间的花岗岩石碑倒是没有遭到损坏,被推倒挖出后,搬运到一个堆放旧物的院子里,一放就是四五十年。

2003 年初冬的一天,笔者在晨练时,由马鞍山顶雷达站向东下台阶时,发现有一节青石断碑被铺在台阶上,仔细一看,上边有“全骨肉、安社稷、利人民、为国家”和“大清乾隆五十年”等字样,但不知是什么碑。几个月后,有一

次将要走完山顶雷达站小南门的台阶时,无意之中,发现最后一级台阶上赫然刻着“明太常”三字,这是一通青石碑的上边一部分,厚 21 公分,宽 80 公分,由于被压在最底层,不知道它有多高。官至“太常寺卿”的,昆山历史上只有夏杲一个人,但他的墓在县东南的迎钟浦以北,而不在马鞍山下,绝不会是他的。由此断定,此碑只能是死后被葬在昆山的江西分宜人黄子澄的了。但此时还不了解这两块残碑之间的联系。



我将这两次发现和判断对当时公园管理处杨磊主任和华藏寺秋风法师讲了,他们很乐意为发掘、保护马鞍山的文化遗迹作些工作和贡献。秋风法师与有关方面协商,将山顶那块石碑先行运回寺里保护了起来,并请我去看过。碑的另一面有没有文字是我最关心的。一看,竟然是“寺卿分宜黄”几个大字。这是与小南门最后一块台阶石紧接着的一块青石碑,是黄子澄墓碑的中间那一部分。

这期间,我又通过市档案馆的沈明等同志帮忙,从《昆山见存碑刻录》(抄本)上复印了《明太常寺卿黄公墓碑》的碑文。2005 年 4 月中旬,公园管理处也将小南门内的那块残碑掘出以一块水泥板材将其调换,运回管理处保护了起来。我对照几种资料,与朋友一起,对碑文进行了抄录、校对和断句,订正了碑文(书面文字)的几处错讹。

黄子澄墓碑的全文是:

士之见用于世者,所遇有幸有不幸,

而惟取义成仁者,足以扶世翼教而垂诸不朽,其事之济与不济,固不必□论也。

江右分宜黄公,讳湜,字子澄,当前朝建文之代,以太常卿入阁与机务,不可谓不用者矣。愿其时承分封太侈之际,诸王骄奢纵恣,官民并被其毒而□为尤甚,浸

浸乎已有帝制,而天子自为之意。公慨然与齐泰辈创约削护卫之意,所以全骨肉、安社稷、利人民、为国家久远计,岂得谓非大臣谋国之道而□其不宜然欤。不幸

兴事大骤,无智沉勇深之人相与从容审慎、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至于用兵屡失机宜,而天子又复避杀叔父之名,以是忠□不遂,三数年间而祸败不可收拾。遂有开门迎敌、惜死恋爵者反颜而共成之。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然公犹承密旨南下,纠兵结誓,时为兴复之计。迨至万无可为而就擒。新君惜公之才,数以温旨相劝借,谓魏征、赵普亦可师法,而公终毅然不顾,且直斥其悖谬之实,至于断手截足,备极惨伤,频死而不一□。呜呼烈矣!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者,非耶?

公尽节后,其次子仲玉与其兄仲珪窃其骸骨,变姓名、易服色,窟伏苏淞间。事释而葬之昆山之阳,因寄籍而□守焉。死即附葬于其侧,盖忠孝出于一门矣。

厥后年远世变,丘墓屡以圯夷,至有争侵而践毁之者。土人以为数有风雷震荡之异。夫神怪之道,圣人所不语,即谓天佑

忠魂，其事未必遂无而学道之君子，类不欲铺张怪异以启恒流之惑者，虑以附会诬经正之理也。惟是表忠励俗、兴废举坠，则守土者之责，不敢辞焉。于是稽厥旧迹，询诸绅士之好义者，复其冢而系之以铭，用以愧夫为人臣不竭忠谋，又以成败论人而不乐成人之美者。其出身世系则既详于邑志而不复赘云。铭曰：

娄江之北，昆山之阳。忠魂烈烈，山高水长。公事未济，公节则扬。有死无二，生直之刚。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不罔而生，千秋万禩。

赐同进士出身截取知县召陵赵遵律篆盖

特授文林郎知昆山县事壬申科举人河东裴元长撰文。

候选知县庚子科举人孙铨书丹。

阖邑绅士徐昂、杜群玉、周开先、徐文源、周时照、杜纲、钱大吉、李世经、杜昂、

李睿、李璋、朱东果、席存泰、夏虎臣、叶廷铨等公举。

大清乾隆五十年岁次乙巳冬十月。

立碑时间是1785年11月，距今已近230年了。万立钧来新阳代理县令时，曾于1894年（光绪甲午）为黄子澄墓重新封表，并立了一块新的花岗岩墓碑，这块墓碑倒是还完好地保存在亭林园里，它也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历经清末、民国一直到现在。

到这时，可以说清乾隆年间的黄子澄的墓碑实物已经找到了三分之二，另外一部分还有待于进一步寻找和发现。

2004年12月，黄子澄的第二十五代侄孙曾经两次千里迢迢地从江西分宜来到昆山，想寻找黄子澄墓碑拓印一下，在家乡建一座“黄子澄纪念馆”。我为他们提供了有关的文字资料和图片，还带他们到华藏寺后院拍摄了几张残碑的照片。去年又有黄氏后裔从南京前来寻觅有关资料。最近从网上得知，“黄子澄纪念馆”已经建成开放，接待参观者，颇感欣慰。

亭林园中还保存有清乾隆时期的县官裴元长题刻的“黄节愍公子澄之墓”的花岗岩墓碑一通。若能将其利用起来，和那两块残碑一起，在墓地原址上象征性地建一个“黄子澄墓遗址”，再立上一块碑子作以说明，倒也是很有意义的。黄子澄是春申君黄歇的后代，是安葬在昆山的职务最高的外地人。他的儿子为了感谢昆山，定居昆山后倾家荡产、并得到县衙的帮助，将东塘街至和塘上的危桥“高板桥”拆除，重建起了一座高大宏伟的石拱桥，将其改名为“富春桥”。六百多年过去，经过几次重修，这座桥至今还稳跨河上，默默地为昆山的老百姓服务着。昆山是黄子澄的安息之地，我们应该开发和利用好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发展昆山的文化旅游事业做一些具体的贡献。

